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

局內人的參與式觀察與雙重處境

Journalistic ideology of citizen journalists:

Insider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double situations

王貞懿

Chen-Yi Wang

指導教授：林麗雲 博士

陳順孝 副教授

Advisor: Lih-Yun Lin, Ph.D.

Shun-Xiao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July, 2019

誌謝



在印出紙本論文寄給口委、在結束論文口試的當下，以及打著謝誌的此刻「終於，完成了一件很想完成的事。」

言謝，一直以來都不是容易的事，畢竟心意之深重，難以用言語來呈現。首先謝謝我的家人，爸爸、媽媽、妹妹、弟弟、阿嬤，讓我能毫無後顧之憂的學習；我的男朋友也是好朋友陳林生，讓我們能一直望著同一個方向前進。

謝謝麗雲老師、阿孝老師在學業上、生活上，給予我最珍貴的指導與陪伴。從論文視角、整體結構、理論脈絡到文字鋪陳，如果不是他們，我可能無法走到這一天。謝謝五位受訪者，將他們實踐公民新聞過程之中的反思、個人的生命故事做無私的分享。

能順利地在交換結束的學期，告別相處了六年的台大，最關鍵的靈魂人物，就是歐洲好夥伴——張庭肇。謝謝他在無數的夜晚，不厭其煩地陪我一起討論著紊亂的想法，貢獻他對人類學的認識。一起聊著研究生日常，最平凡但真實的人生規劃，一邊計畫著什麼時候出遊，一邊讓論文得以順利的前進。在這裡就祝他能早日成為奇男子，遇到能相知相惜的對象。

最後，謝謝台大，這所校園帶給我很多人生重要的能力、體驗與夥伴。

中文摘要



本文從人類學視角出發，將局內人公民記者視為是參與式觀察中的本土人類學家。透過深度訪談法，探究局內人如何當公民記者、如何形成自己的新聞意理，提供了一個以公民記者自我詮釋為主體的新聞意理研究。研究結果發現，社群認同的深淺是影響公民記者新聞意理、記者自我角色認知的關鍵因素，本文一共歸納出兩種意理類型，分別為：參與者意理與觀察者意理，在社群成員關係、採訪語言、參與頻率、報導立場、報導中的現身程度、報導責任等面向展現差異；點出除了賦權、培力之外，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關係的親疏遠近，也會影響公民記者們的報導理念、策略與實作。

關鍵字：公民記者、新聞專業意理、參與式觀察、局內人、本土人類學家

英文摘要



Based 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considers citizen journalists as participatory observers who have long participated in a certain community, namely, the native anthropologists in the fiel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offers research concerning citizen journalists' own reflection and explores how they become a citizen journalist and form their journalist ideology.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degree of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is the key factor of citizen journalists' journalistic ideology and professional roles as citizen journalists. This study categorizes two types of ideology: participant's ideology and observer's ideology. Their differences are shown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within the community, language, frequency of ordinary participation, narrative, standing point,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reports. In addition to empowerment, the intimac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news sources also affects citizen journalists' news philosophy,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Keyword: citizen journalist, journalistic ideolog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sider, native anthropology

目錄



誌謝.....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圖目次.....	v
表目次.....	v
第一章 問題意識.....	1
第二章 文獻評述.....	5
第一節 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與新聞實踐.....	5
第二節 局內人公民記者的角色位置.....	17
第三節 小結.....	29
第三章 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32
第一節 研究問題.....	32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3
第三節 研究對象.....	37
第四章 研究結果.....	39
第一節 觀察型「參與者」.....	39
第二節 參與型「觀察者」.....	65
第三節 小結.....	78
第五章 結論.....	82
第一節 結果與討論.....	82
第二節 貢獻與限制.....	88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92
參考文獻.....	93

圖目次

圖一：參與式觀察中的研究者角色位置.....	22
------------------------	----



表目次

表一：參與式觀察中的參與類型.....	20
表二：訪談大綱.....	35
表三：受訪者名單.....	38
表四：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意理類型.....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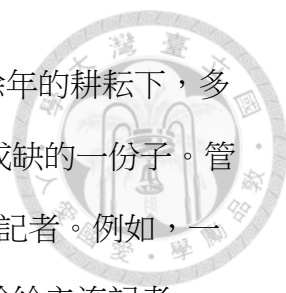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問題意識



近年來，從八八風災、苗栗大埔案、樂生療養院、反國光石化等重大的社會事件中，都可以看見「公民記者」參與其中。在八八風災期間，排灣族部落公民記者 Valjeluk Katjadrepan 就以原住民視角出發，讓外界知道部落災情與災後重建的不同面向；定居台東南橫公路起點的洪春景，於八八風災後推出紀錄片，讓世人見證南橫災後的柔腸寸斷和沿線居民的艱難處境；身為應用地質技師的陳本康，從地質結構切入，探討捷運工程經過樂生療養院院址潛在的公共安全危害；服務於彰化縣環保聯盟的吳慧君，屢次透過報導揭發土地汙染事件與傳遞受害居民的心聲；身為苗栗客家子弟的陳治安，將大埔鑛田事件製作成英文版本上傳 CNN iReport，成功扭轉地方議題的能見度。

他們既是公民記者，也是報導議題上的「局內人」，帶著原先的身分和理念投入公民新聞產製，也因長時間的參與觀察，與受訪者之間往往不僅止於「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這與一般新聞從業人員或是大眾對於記者必須中立、客觀，保持情感疏離的認知相去甚遠。

Bowman and Willis (2003, pp. 9) 對公民新聞所下的定義為：「由一個或是一群公民，主動地進行蒐集、報導、分析、傳播新聞以及資訊，目的是提供民主所需具有獨立、可信賴、正確、廣泛及具有意義的訊息」而負責產製公民新聞的人即稱為公民記者。曾提出公共新聞學概念，後來積極推動公民新聞的紐約大學教授 Rosen (2006)，則為公民記者做了個簡潔有力的陳述：「那些從前被稱為是觀眾的人 (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他們現在開始參與進新聞產製過程，要求自己的聲音被聽到。」



我國的公民記者，在公共電視「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十餘年的耕耘下，多次成功扭轉未獲主流媒體關注的議題，是我國公民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管中祥（2015）更曾提到：「公民記者的專業能力並不會遜於主流記者。例如，一位對生態、環保多所涉獵民眾，在環境新聞的專業能力未必會輸給主流記者〔……〕他們在編採寫及拍攝、剪輯專業技能上也許不比主流媒體，但議題的理解、分析等專業知識上，說不定是個無人能敵的專家。」

Coward（2013）也曾提到：「當代新聞充滿了人，一群『speaking personally』的人。」從我出發、從個人出發，來自不同階層、文化的人，能夠替自己所屬社群發聲，更促進議題的多樣性，「熟悉」與「遍地開花」成為公民記者的優勢。當有著不同生命經驗的公民投身新聞產製，就有潛力實現民主社會珍視的多元、反霸權、草根觀點，這種更高層次的社會共好，某種程度上鬆動了報導常規上的要求。

未受過正規新聞訓練公民記者，在報導時往往不會注意到：正反並陳、倒金字塔寫作、區分事實與觀點、第三人稱敘事等新聞報導常規（陳順孝，2005）。公民記者的出現，挑戰了被新聞學奉為主臬的「客觀性意理」，因此也常招致不夠專業的批評（何國華，2007；Blaagaard, 2013; Paulussen & Ugille, 2008）。

不過，當前對公民記者的學術討論，並不如公民媒體、公民新聞來得豐富，對於公民記者的了解主要依附於平台研究，停留在基本資料的靜態描述，或以使用與滿足和其他心理學理論，探討公民記者的發文動機，但卻缺乏對公民記者養成、參與歷程的深度描繪（王晴玲，2007；邱千瑜，2008；蔡孟珊，2010；蕭博仁，2009）。關於公民記者們對新聞意理的認識，也直接使用傳統新聞學意理為框架去做量化研究（洪婉甄，2009），而忽略了公民記者多樣的本質。因此，本研究認為，公民記者應是其新聞實踐的詮釋主體，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的形塑，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與其過往的生命經驗及新聞培力歷程息息相關。



2008 年，陳順孝（2008）提出將公民記者以本土人類學家（native anthropologist）¹去理解，更能掌握公民記者價值所在的說法。根據 Narayan（1993）的定義，本土人類學家是指原文化出身的人，在受過人類學訓練後，回到原文化中進行田野調查，並以局內人的角度出發，提供與外部觀察者截然不同的角度與不易察覺的發現。陳順孝認為不該把公民記者視為是專業記者的補充者，他們的價值在於散布於不同的場域，能深入傳統記者無法觸及、缺乏關注的議題；同時，公民記者身為局內人，因此帶有個人意見的主觀揭露，更能突破傳統新聞常規的議題框架，不必刻意追求新聞常規。

若吾人用本土人類學家的觀點分析，這群局內人公民記者，就是使用人類學「參與式觀察法」在田野中進行報導的研究者。本文以此為研究視角，希望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與新聞學進行對話，探討參與式觀察中的角色位置，如何影響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其新聞意理，會因為不同的角色位置產生什麼差異？

本研究以局內人公民記者作為研究對象，為了使公民記者成為其新聞實踐的詮釋主體，對其進行深度訪談，並透過線上閱讀其報導、公民記者受訪片段等檔案資料進行交互驗證，了解他們如何在從事公民新聞的過程中形塑自己的新聞意理。並進一步依參與式觀察中的角色位置，將研究對象其分為觀察型參與者、參與型觀察者兩類，分析其新聞意理之異同，具體包含：他們如何定義新聞的本質？如何定義什麼是有價值的報導？如何理解客觀性意理？

背負著原社群、原文化期待的局內人公民記者，當社群認同與新聞訓練發生衝突時，是如何做出決定？這樣「局內人」與「記者」身分的雙重處境，如何體現在他們的新聞意理中。

¹ 原文中，陳順孝使用土著人類學家。但人類學中描述相同概念之名詞多為本土人類學家／在地人類學家或部落人類學家，故本文加以改寫。

為了解這群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類型，本研究通過分析投入公民新聞的動機、做為參與式觀察者的位置、報導時面臨的雙重處境及培力歷程，捕捉他們從閱聽人變成行動者的動態歷程，及影響其新聞意理的關鍵。



當前對公民記者的新聞實踐、新聞意理的評估，常以主流媒體的傳統規範為框架；忽略了公民記者組成的多元性，更脫離了公民記者們的意志。既然公民記者的群像、培力管道與傳統記者不同，社會大眾與公民記者本身，對公民新聞的期待也有所不同，理應具備一套不同的公民新聞意理。本研究希望彌補當前的學術缺口，讓公民新聞意理之內涵更為立體，並呈現公民記者的的主體性、檢驗他們如何自我詮釋對於新聞意理的認知。

借鏡本土人類學家與參與式觀察法，理解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意義在於：他們都在田野現場具備身分的多重性，打破了新聞學（人類學）學科中，對公民記者與受訪者（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關係的預設，以及賦予了公民記者（本土人類學家）在公民新聞（民族誌）書寫立場上更多的自由，是以能找出一個評價公民記者新聞實踐的新可能。

第二章 文獻評述



為了探討以本土人類學家理解公民記者，引入參與式觀察為分析視角是否更能貼近公民記者的新聞實踐，並且了解局內人公民記者如何形成新聞意理，本章第一節回顧專業記者的新聞專業意理內涵，並探討我國公民記者新聞實踐及新聞意理的相關研究。第二節，則引入本文的研究視角，回顧參與式觀察法以及本土人類學家的理論及概念意涵，指出局內人公民記者身分的多重性，如何影響他們在田野中的角色位置，又如何進一步影響他們的新聞實踐與意理形塑。

第一節 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與新聞實踐

壹、新聞專業意理

新聞專業意理是新聞從業人員做為專業人士，所享有的一系列理念與實踐，用以正當化其職業、說明新聞工作的社會意義（Hanitzsch, 2007）。因此，新聞專業意理就是體現於報導中，在實踐中培養，不斷變動、調整的一套價值體系。

歸納新聞專業意理的學術討論（Deuze, 2005; Schudson, 2001; Zelizer, 1992），從具體操作規範到抽象價值觀，依序可分為三個面向，包含：專業技能（specified skills），例如拍攝、寫作的技巧；規範（norm），例如報導應該追求真實、公正與客觀；以及最重要的價值觀面向，如自主權²（autonomy）被認為是記者抵禦內、外部多重壓力的核心，使記者們能挺身對抗霸權或拒絕金錢收買，致力於追求真實。這三個面向，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不斷地彼此影響，難以切割，並內化成為一種日常工作的指南。

² 參考 Weaver & Wilhoit（1991: 76-77）在測量美國記者享有何種程度的自主權時所設計的問卷題向，自主權概念包含，記者是否能自主決定想要採訪的新聞題材、決定使用哪些採訪片段及報導要側重的角度，以及他們所做出來的新聞是否會受到其他人的編輯修改。



既然新聞專業意理，是記者個人對其職業專業價值（功能）的一種理念認知，過往的研究者常以「記者應扮演何種專業角色（professional roles）」為題，企圖分類記者的新聞專業意理。

而許多關於記者職業角色的相關研究，也致力於提出不同類型或是影響構面，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以「理念」做為分類依據，如：Cohen（1963），針對外交記者進行調查，歸納出兩種記者角色，分別為中立客觀的報導者（neutral reporter）以及參與者；Johnstone, Slawski, and Bowman（1972）也發現類似的記者角色，如中立的觀察者（neutral observer）與參與者；Janowitz（1975）則提出守門人（gatekeeper）及鼓吹者（advocate）兩種意理類型。而集大成的是Weaver and Wilhoit（1991, 1996），他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將「參與者」，再細分為解釋／調查者（interpretative／investigative role）、對立者（adversary role）以及民粹動員者（populist mobilizer）³；而稱帶有中立客觀色彩的記者角色為資訊傳佈者（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ole），他們會使用第三人稱敘事、正反並陳、直接引述等寫作規範，來到客觀中立的目的。不過上述記者意理角色類型，皆採問卷調查的量化研究途徑，未能深入解釋影響記者新聞專業意理類型的因素。

本研究旨在關心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是故，選取的研究對象都偏向參與型的記者意理；因此，上述針對記者角色類型建構的相關文獻，對本文的啟發在於「理念型」分類的特色。首先，因為是理念分類，故在同一個記者身上，可能出現不只一種記者意理；其次，多項研究結果都表明，記者意理中，帶有中立客觀色彩的資訊傳播者相當顯著，顯示出客觀性意理在記者職業文化中的重要

³ 民粹動員者（populist mobilizer），根據 Weaver and Wilhoit（1996）所提出時的敘述，此種記者角色特徵包含，激起大眾對知識、文化的興趣，提供娛樂、做政治性的議題設定，提供可能的解答、鼓勵公民參與並給予其發表機會。

性。因此在嘗試建構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時，本研究也關心他們對於客觀性意理的理解、詮釋與實踐。



Mindich (1998) 曾說，如果美國的新聞界是宗教，那麼至高無上的神性 (deity) 就是客觀 (objectivity)。Schudson (1978, 2001) 也提到新聞客觀性的要求至今仍佔據主流的新聞圈，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Weaver and Wilhoit (1996, pp. 224) 調查美國記者們最偏好的角色類型時，不論媒體類型，有近半數的人認為做一個客觀中立的資訊傳播者是非常重要的，對電視及新聞通訊社 (wire service) 記者來說，尤其如此。

對於客觀性意理的追求，已發展為一套新聞常規，存在於記者的新聞實踐中 (Richards & Rees, 2011; Wien, 2005)。學者彭家發 (1994, 頁159-169) 綜整國內外的文獻發現，客觀性本來就是多重面向的概念 (multi-faceted)，常與一系列的詞組，如：公正、中立、準確、公平、誠實、真實等共同出現。「客觀」概念的多義性，使得它不僅只是一種價值 (value) 也是一種程序 (procedures)，在任何的新聞產製階段都有可能出現，並影響記者的選擇 (Schiller, 1981)。一般來說，客觀性寫作的要件主要涵蓋兩個概念，第一點是要忠於事實；第二點是要能平衡地處理資訊、去除偏見。

美國學者Kovach and Rosenstiel (2001) 在其經典之作《新聞的要素：新聞工作者須知與觀眾的期待》(*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 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一書中提到，新聞的首要任務就是：追求事實與真相，對於真相的追求，正是區隔新聞與其他傳播型式的根基。而所謂的新聞真實 (journalistic truth) 指的是一種有時續性的整理過程 (sorting-out process)，第一步，就是杜絕錯誤訊息、虛假訊息及自我宣傳；接著是讓社群反饋，讓新聞成為一種追求真實的對話。他們認為：對「客觀性」的追求，應該基於具有一致性的資訊驗證方法，而不是要求記者個人達到客觀。



為了平衡地處理資訊，消除偏見，記者經常通過客觀性寫作來達成此目標。客觀性寫作應具備的特色如下（McQuail，1992；Schudson，2001；劉建明，2003）：第一，在報導中區別事實與意見，直接說明事實或意見的來源，而非表明記者的立場；第二，客觀敘事，使用第三人稱進行報導，語調上應該冷靜（cool），而非情緒化；第三，要竭力地在報導中，公平呈現不同立場的聲音，也就是常說的正反（多元）並陳。

除了客觀性寫作的特色外，在有限的篇幅、資源、時間壓力下，新聞記者究竟如何決定什麼事情該被報導？什麼不用？這就仰賴所謂的「新聞價值」判斷，亦是一種新聞專業意理的展現。新聞價值就是一套展現記者專業意識形態的選擇體系（Palmer, 2000），除了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外，更是記者一代一代相互傳承下來的共享知識（Richardson, 2005, p. 173-174）。彭家發（1997: 34）認為記者的新聞專業意理，因為在媒體組織這般的親密團體內工作，會受同儕及組織規範影響，也呼應了這樣的說法。

為了因應新聞工作的快節奏，針對一個事件是否具有新聞價值，實務上也發展出了可量化的客觀標準，主要以閱聽人是否會買單（感興趣）的預期心理為基礎（Galtung and Ruge, 1973）。例如：「影響性」，有多少人會受到影響？「接近性」，事件發生地點與讀者的距離；「即時性」，新聞價值隨著時間的消逝而遞減；「顯著性」，如果對象是公眾人物，那報導價值就大；「意義性」（Meaningfulness），在文化上對讀者是熟悉的；「負面消息」，負面新聞更能引起觀眾興趣；「奇異性」，（Galtung and Ruge，1973；彭家發，1992）……等。

關於新聞價值的內涵眾說紛紜，但更關鍵的是，這些在新聞圈所傳承下來的特定範式、以讀者喜好為出發，追求最多人目光的商業邏輯，讓許多對人類未來有所貢獻的資訊，因為太過平淡而無法被報導（DeFleur, 1991）；媒體組織有固定的版面，編輯台勢必對一天中所發生的新聞事件進行相對新聞價值的取舍

(Reisner, 1992)；定型的新聞價值，往往也伴隨著既定的報導框架；這些常模化的故事，讓真實生命經驗中的複雜性與多樣性消失（Blood, Putnis, & Pirkis, 2002; Detenber, Gotlieb, McLeod, & Malinkina, 2007）。



公民記者與公民媒體的加入，為新聞報導開啟了新的機會。一來，本研究所觀察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並不會對報導內容進行審查，能夠消除Tunstall（1971）口中，編輯台現象踰越記者專業，影響其新聞選材、報導內容的疑慮，並有利於提供既有主流媒體框架外的報導。二是，未受雇於任何媒體組織的公民記者，相對享有更高的自主性，去抵抗媒體組織的意識形態或政治經濟的壓力。再者，公民記者之間的合作與互動，不如組織記者般強烈，也就較不易受組織規範及記者同僚影響。因此，公民記者們是否已經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新聞意理，以及其影響因素為何，正是本研究的核心關懷。

在嘗試捕捉並分析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類型時，因學術上對於公民記者是否已經發展為一種「專業」缺乏共識與討論（Örnebring, 2013），且公民記者之定義、組成多元（Knight, Geuze, & Gerlis, 2008; Tilley & Cokley, 2008），故以公民記者新聞專業意理為題的相關研究及理論仍然相當缺乏。承上所述，吾人也認為，以「新聞意理」來描述公民記者所持的新聞理念，相對「新聞專業意理」來得更為合適與貼切，更能凸顯公民記者之於新聞領域、公民社會的特殊性。

目前對公民記者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之相關討論，多聚焦於突發性新聞事件中，如危機事件與災難事件中扮演目擊者（Allan, 2013; Andén-Papadopoulos & Pantti, 2013）的角色，或是討論社會運動中，如阿拉伯之春裡公民記者所發揮的功能（Hamdy, 2009; Khamis, Vaughn, & Society, 2011）。這種短期、激情的公民新聞行為，不易形成、發展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也與本文所關懷的「局內人公民記者」那種耕植於對社群的使命感和長時間的觀察的理解不符。

是以，本文回顧新聞專業意理的意義在於：建立一套能更有系統性探索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架構。在上述文獻的基礎上，歸納出三個新聞意理的面向，再透過深度訪談蒐集局內人公民記者對這些意理面向的理解與詮釋，以深化公民記者新聞意理內涵與類型，並進一步發掘他們所抱持的新聞理念。

第一個新聞意理的探索面向，是公民記者們對「新聞工作本質的認知」，即他們是否依循「新聞報導要以事實為根據」，致力於對真實的追求。第二個重點則是，公民記者對於客觀性意理的認識、認同、詮釋與實踐，而客觀性意理具體體現於：(1) 是否區分「事實」與「意見」，閱讀報導時是否會發現報導者的個人立場；(2) 報導中使用第幾人稱敘事；(3) 是否讓立場各異的一方，都有表達自己的機會。第三個面向則是，公民記者報導什麼？透過新聞題材的選擇，分析其背後所抱持的新聞價值，再進一步針對其新聞意理類型進行分類。

貳、我國的公民記者群像

Gillmor (2006, pp. xxiv) 認為，未來新聞學的發展，應該是一種對話式的新聞，而參與其中的新成員，就是各具關懷的公民記者。除了第一章Rosen

(2006) 對公民記者所下的定義——那些「過去的觀眾」開始參與新聞產製，以求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之外，也有學者使用是否「服務、受雇」於媒體組織或新聞機構、有無受過系統性的新聞「訓練」來定義公民記者。相對於受過新聞訓練，受雇於特定媒體組織者，享機構內部擁有的技術、工作流程及新聞常規的專職記者們；未受過系統化訓練的「業餘者」就是公民記者 (Kaufhold, Valenzuela, & De Zúñiga, 2010, pp. 517)；亦或是以在新聞產製過程中，有沒有受到干預為依歸，如Nip (2006, pp. 218) 定義公民記者為：「未受到記者或新聞組織干預 (intervention)，而進行採集、生產、具象化 (visioning)、發表新聞產品的人」。

在科技與網路的相輔相成下，紀錄新聞事件的門檻降低，人人都可以做報導、當記者（Smith, 2007），一改過去閱聽人只能被動接受訊息的處境，公民能直接影響媒體的議題設定，為公共討論、動員提供一個新的機會（Papacharissi, 2009, pp. viii），台灣也沒有缺席這場公民新聞運動。

二十一世紀之初起，我國許多有志之士透過舉辦工作坊、設立相關獎項、創辦公民媒體，培育具有公民意識的寫手（陳順孝，2012）。2007 年，「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創立；2009 年，莫拉克風災重創台灣，公民透過網路相互查證災情，積極參與資訊傳播，填補了主流媒體之不足（鄭宇君，2014）；2010 年，由公民記者大暴龍發表的「當怪手開進稻田中...」，成功將一個邊緣的地方土地徵收案扭轉成全國層次的討論（Hung, 2015）；2011 年，大法官釋字 689 號指出：「新聞自由〔…〕，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足見公民記者存在的價值為憲法所認可，無疑是對公民新聞的一個鼓舞。

2007 年由公共電視成立的「PeoPo 公民新聞」，定位為一個強調開放、分享與行動的影音公民新聞平台⁴，不會針對公民記者所上傳的內容進行事前編輯台審查。不同於商業媒體，PeoPo 召集人余至理表示，強化公民的傳播權與進行培力才是 PeoPo 誕生的意義（PTS, 2015, February）；而 PeoPo 也沒有辜負這樣的使命，設有專人負責組織相關的培力活動，經過多年穩定的經營，培養出一批具參與度、有策略的公民記者，不像因社會運動、天災而起的公民媒體往往在階段性任務達成後，漸漸失去活力（胡元輝，2017）。做為由公共電視台推出的公民新聞媒體，相較於商業媒體所創立的公民新聞平台，PeoPo 上的公民記者，更能確保在其新聞產製的過程中，不會受到商業或組織力量的干預。

⁴ 引自 PeoPo 開站發刊詞（2007 年 4 月），〈風起雲湧的新群眾運動〉。相關內容亦可見於：胡元輝（2007），《媒體與改造：重建台灣的關鍵工程》一書當中，頁 231。



據第一章所述，我國公民記者中有一群人，原本就是特定社群的深度參與者，甚至是新聞事件中的當事人，即本文所關心的「局內人公民記者」。然而，國內關於公民記者背景的研究，仍缺乏大規模的系統性調查；同時，以公民記者為題的學術研究，在數量上不及公民新聞或公民媒體，且理論內涵不足，多停留在現象描述（陳楚潔，2016，頁253）。不過，還是能從過往的學術研究中，發現這群局內人公民記者的身影。

例如，王晴玲（2007）指出，PeoPo在創立之初就選定的特定社群成員，做為公民記者的重點培力對象，包含：NPO（非營利組織）與NGO（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社區大學成員以及學生等。蕭博仁（2009），以PeoPo平台如何進行在地扎根為題，也發現這些加入PeoPo的公民記者，主要是在校園、社區大學、或非營利組織的活動中，經由PeoPo人員的推廣接觸到公民新聞的概念。從上述的文獻中可以發現，兩種局內人公民記者可能的來源，一是，具有特定倡議理念的NPO或NGO工作者，二是具有社區意識、在地關懷的社區大學成員。

孫曼蘋（2009，頁156）則以台南縣後壁鄉菁寮社區為例，討論公民新聞與新農業文化再造運動的關聯，就更完整描述、指出「局內人公民記者」的存在，她發現這群參與新農業運動的草根公民記者，大部分是多年的社區總體營造行動者，對社區與社群有強烈的認同，並希望透過媒體的在地發聲，讓社區或社群能被看見，而這群人所報導的主題，就圍繞著農村、生態環保或社區改善等議題。從此研究中，亦可歸納出另一個局內人公民記者可能的來源，除了社區、地方外，這個社群可能是以「職業、產業類型」為認同而凝聚而成的。

另一種局內人公民記者的身影出現在原鄉，特別是八八風災後，PeoPo出現了很多部落記者，他們從局內人的視角，報導重建的過程，如公民記者南方部落重建聯盟代表人叮噹，她更直接點出公民記者的報導意理，會受社群認同與身分影響。「我們也必須去討論說，這適不適合播？或是它對原鄉造成的影響是什

麼？……，我們自己看得很重，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傷害到自己的朋友，或是自己的族人。」（2010年4月11日，引自PeoPo線上教學頻道⁵）叮噹的發言，不僅指出「族群」可能是局內人公民記者社群認同的來源，也彰顯本研究視角的重要性。

本文旨在探討局內人公民記者，如何形成他們的新聞意理？由於國內目前關於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研究相當不足，本文所選擇的研究對象、研究視角，亦有其特殊性；因此做為一個初探性研究，在本節的下一部份，將盡可能地與我國現有文獻中討論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與實踐之研究進行對話，協助建構一個更細緻的理念型分析架構。

參、我國公民記者意理與實踐之相關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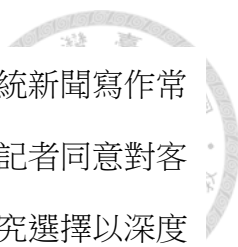
根據文獻探討，新聞專業意理就是記者對其職業角色所抱持的專業意識型態，而此意識型態，會成為記者日常工作的指南，並體現於其新聞實踐中。

2015年，林宇玲使用內容分析法，分別對PeoPo公民新聞台、上下游新聞市集、新頭殼，以及今日新聞網的WEnews平台上的公民新聞實踐進行考察，其研究結果指出（頁206-208），在敘事文體方面，PeoPo公民記者使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比例相當；在報導敘事上，客觀陳述、主觀評論及個人感受都可見得⁶；在敘事結構上主要採重點分散式，不會拘泥於傳統倒金字塔的寫作慣習。總的來說，PeoPo平台上大多數的公民記者，在報導時不會遵循客觀性新聞寫作的要求，如：第三人稱敘事、客觀陳述，展現出較多另類風格。

觀察公民記者的新聞實踐，可以發現他們可能各自抱持著不同的意理類型，不過此研究僅使用內容分析法，並無法對公民記者形成不同意理的原因，提出更

⁵ 線上教學頻道，（2010年4月15日），〈公民記者經驗分享 公民記者南方部落重建聯盟〉。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50100>

⁶ 林宇玲的研究發現PeoPo公民記者以發表報導的形式居多（相對於：評論、紀錄、動員等其他文類），她將其歸因於平台提供的培訓課程。她指出，雖然公民記者們會使用報導的行文方式，但內文卻未必符合客觀報導的要求。



深入的解釋；也無法知道公民記者們是因缺乏專業訓練而未遵守傳統新聞寫作常規，還是這是一種刻意的選擇；同時也忽略了另一種可能，即公民記者同意對客觀性意理的追求，但實踐上卻仍不符合傳統新聞學的標準。而本研究選擇以深度訪談的方式，正是希望能讓公民記者成為自己新聞實踐及意理的詮釋主體。

過去，也有研究者使用質性的研究方法，探討獨立記者或專／職業記者的新聞專業意理（郭嫻君，2010；管嫻媛，2008；蔡士敏，2008），雖然研究對象不同，但對本研究仍然有所啟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將影響新聞專業意理的因素，從強調媒體組織的科層結構、記者間所共享的新聞常規，轉至關心記者「個人生命經驗」中其他的關鍵事件。

對本研究對象主體——局內人公民記者而言，其過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對所屬社群的羈絆，也就是他如何變成一個局內人、他對社群身分的認同感從何而來。而除了局內人的身分外，他們「公民記者」的身分，即公民記者們經過哪些新聞培力，對新聞工作、記者專業角色的認知為何，也是影響其新聞意理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為了探究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內涵，並進一步分析討論其異同，其「社群自我」與「記者專業我」的身分認同與相關經歷，便是研究關懷的核心。而串聯起這兩個身分的，就是公民記者投身公民新聞的初始動機。

關於投身公民新聞的動機研究，有的研究者從平台使用動機的角度出發，如：王贈凱（2009）利用使用與滿足理論，經問卷調查歸納出：便利／功能性、自我表現以及成就感三項使用動機；邱千瑜（2008）使用觀展／表演典範出發，發現公民記者使用平台，是為了展演個人書寫或傳遞發布社群資訊。上述研究，因研究視角的選擇，側重公民記者對平台的評估及討論平台功能，對於公民記者投身新聞產製的原因著墨相對粗淺。



蔡孟珊（2010）以 PeoPo 高參與度公民記者為研究對象，用 Maslow 動機階層理論為基礎，探討他們加入公民記者行列後各階段的動機，其中她也對報導主題、使用的報導型式（影音／圖／文）等進行文本分析，歸納出公民記者報導的特色，並透過深度訪談中探詢他們選材理由，包含：生活與工作、個人喜好、所屬族群的議題取向、認同地方與保衛弱勢的心理等，這其中都能看見公民記者有展現「局內觀點」的潛力。不過，因研究旨趣不同，她並沒有將上述發現，與公民記者的主體生命經驗做更深入的說明。

總的來說，上述的動機研究，忽略了公民記者個人過往的生命經驗與其行動轉變的關聯，將公民記者投身公民新聞產製的動機，視為單一時間點的轉變，卻無法解釋，為什麼許多人都有表達自我的需求、追求成就感的需求，卻沒有成為公民新聞的內容貢獻者。

在「社群自我」面向，除了本節上一小點，能從公民記者來源推敲局內人公民記者所屬社群外，同樣屬於新聞意理概念中一環的「如何選擇報導題材」中，也可以看見局內人公民記者的身影。彙整國內相關研究發現，公民記者的新聞選材標準，主要有以下特色／理由：(1) 就近／就地取材；(2) 取材自長期關心的議題（如：環保、生態）；(3) 個人職業；(4) 鄉土情懷；(5) 族群身分；(6) 跟隨主流媒體（王晴玲，2007；孫曼蘋，2009，蕭博仁，2009）。除了跟隨主流媒體較看不出其報導選材與社群之間的關聯外，其他選材理由，大抵也呼應了公民記者來源中所發現的社群；不過可惜的是，這些發現停留在靜態敘述，沒有辦法將報導和公民記者本身的生命經驗進行更深層的連結。

2016 年陳楚潔（2016）以傳播賦權的視角出發，討論公民新聞如何賦權民眾，她發現公民記者更強調報導要立足於日常生活與常民經驗，因此有更強的社群意識，亦符合本文局內人公民記者的設定。同時，她也指出平台所提供的培力活動，如授課式講座、蹣拍等實作，以及公民記者同儕之間的互動，都會影響公

民記者的新聞意理，不過卻沒有更深入的點出，這些培力活動具體如何影響公民記者對媒介功能與記者角色的認知。



洪婉甄（2009）觀察到公民記者素質不一，使她開始思考，一向注重專業意理養成的新聞工作，遇上強調草根、由下而上的公民新聞平台，究竟能否被稱為是專業的媒體代表。從此出發，她希望藉由傳統新聞意理建構符合我國現狀的公民新聞學專業意理，並以其成果評估我國現有的公民媒體。她透過文獻回顧，盡可能地完整蒐集新聞專業意理概念中的構面，並以此為基礎，設計修正式德菲法問卷，調查公民記者們是否接受傳統新聞意理。研究發現接受調查的公民記者們，大抵同意所有傳統新聞意理的內涵，唯針對即時性、衝擊性、顯赫性、衝突性、異常性等傳統新聞價值，他們一致表示不認同。然而，雖然公民記者們皆同意其報導應符合客觀中立的要求，卻與他們的新聞實踐相佐。

上述的發現，對本研究有三個重要的意義與啟發。首先，此研究確認了公民記者在決定一則新聞是否該被報導時，他們所考量的因素與傳統新聞價值不完全相同，顯示出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特殊性，但卻未能提供更有脈絡、有系統的解釋。其次，公民記者們認同客觀性意理，在實作上卻與其理念不一致，凸顯了使用質性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公民記者應該是其公民新聞實踐的詮釋主體，藉由深度訪談的過程，公民記者也透過自我敘述，再次確認他們所持的新聞理念，以及梳理影響自己意理形塑的關鍵；最後，洪婉甄的嘗試，對釐清傳統新聞專業意理概念內涵幫助很大，但卻忽略了，以傳統新聞意理為框架所發展的問卷，潛在的問題：一是，此設計似乎沒有打破對專業主義的崇尚，公民新聞學仍被視為附屬於新聞學界自我批判與反省後的產物，僵固的權力關係依然存在；二是公民記者可能發現研究者的意圖，因此影響了問卷選填的真實性。同時，也忽略了公民記者的主體性，使得那些獨立於傳統新聞意理外的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無法被發掘。

最後，觀察台灣當前的公民記者群像，確實可以發現有一群公民記者的報導

帶有特定社群的關懷色彩，而他們長期投身、奉獻的社群，正與其自身族群、職業、理念、社區（地方）密切相關——這群局內人公民記者以自身深刻的觀察、局內視角的出發，為公民社會更多元的聲音。大抵呼應陳順孝（2008）認為應以本土人類學家去理解公民記者，更能貼近其公民新聞實踐與意理的說法。

本研究將這群局內人公民記者視為是參與式觀察中的本土人類學家，希望能透過參與式觀察法理論及本土人類學家概念的引入，借鏡人類學過往的學術積累，不僅是為了要更有系統且細緻地分析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也是希望能回應，局內人公民記者所能為新聞學及公民社會帶來的價值與意義。

第二節 局內人公民記者的角色位置

同樣是重視書寫與文本的學科，人類學與新聞學都企圖透過某種形式的載體，生產對於社會與文化的再現與詮釋（Ståhlberg, 2006, pp. 49）。不過，兩者從事報導的原因及目的並不相同；人類學家最終所發表的民族誌，是追求能力所及範圍內，對於特定文化全面性的描繪；而新聞報導則是著重在挖掘針對特定問題、事件、人物們的事實（fact），強調相關性、時序性、奇異性（Bird, 2010, p. 5-6），相對而言是快速且零碎的文本。不過不論是新聞或是人類學書寫，都同樣反應著特定的文化與價值觀（Grindal & Rhodes, 1986, p. 12-13）。

曾經有位記者說道：「人類學家就是一個擁有兩年截稿期限的記者。」（Grindal & Rhodes, 1986, pp. 11）此說法雖然不完全精準，卻點出了人類學與新聞學本質上的差異：採集資料的方法不同，而這樣的不同也導致兩者實踐上的差異，最顯而易見的就是產出頻率與使用的語言。在市場經濟的壓力下，絕大部分的記者無法享有人類學家從事學術研究般的從容，而不受雇於媒體組織，沒有截稿壓力的局內人公民記者，正可以類比為在社群中使用參與式觀察法的研究者。



壹、 參與式觀察法

Musante and DeWalt (2011) 在寫給田野工作者的教科書中提到，參與式觀察法 (participate observation)，是文化人類學領域中最標竿的研究方法 (Musante & DeWalt, pp. 2)。做為一門研究人類文化的學問，從食衣住行、傳統習俗、法律道德到宗教儀式等等，上述存在於人類社會的現象，都是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題材。文化，是由人類共享、且相互協商並賦予其意義，互相連結成一個體系，而這個體系則「根據人類學習、透過詮釋經驗、行為所付諸的實踐知識而來」(Campbell & Lassiter, 2014)。

根據Musante and DeWalt (2011) 的定義，參與式觀察法，是一種透過研究者參與某一群人的日常活動、儀式 (ritual)、互動、事件，以了解此社群中「外顯」(explicit) 和「默會」(tacit) 之文化的方法。外顯文化指的是文化中人們可清楚表述的部分，在此層次中，人們相對更能順暢地交流、溝通；反之，默會文化是文化中那些人們常常沒有意識、知覺到的部分。因此，可以將參與式觀察法理解為：「在自然狀態下，透過研究者觀察或是參與，社群中例行性及非例行性活動，來蒐集數據的一種方式。」而完整的參與式觀察法，包含資料的蒐集、紀錄以及書寫分析這三個部分。

其中在資料蒐集的部分，人類學家質疑：簡短的訪談、簡單的觀察並不足以深入了解一個社會文化。他們相信，唯有「長期」跟這些當地的居民生活在一起，並取得深入的第一手資料，依循著原則書寫與將資料進行分類，才能有系統地研究文化，因此參與式觀察法更強調透過日常互動、在參與中觀察，而非直接針對特定的行為進行訪問。

人類學家透過和被研究文化中的人們長期相處、交流，試著更深入了解並融入在被研究文化的世界中，成為田野裡的局內人 (insider)，並記錄下交流之中的



所見所聞。而在參與觀察中，這些第一手資料會被稱為田野筆記（Emerson, Fretz, & Shaw, 2011），田野筆記記錄著研究者在參與觀察中所觀察到的一切，而後在民族誌書寫的過程中，研究者會採取在主位觀點（*emic*）和客位觀點（*etic*）交互參照的詮釋方式：所謂的主位觀點，就是研究者使用當地人的觀點，了解他們如何對這個世界進行分類；而客位觀點則是研究者自己對報導人（*informants*）所描述的現象做出解釋，點出他所注意到、且認為是重要的因子（Harris, 1976, pp. 331）。最終這些田野筆記會被整理成民族誌，進而分析與呈現該文化的特色；而民族誌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分析自己在他人生活世界中的經歷，來呈現他人社會現實的一種特殊實踐（Van Maanen, 1988）」。

其中，在參與觀察的書寫階段，主位、客位觀點的轉換，其實就是局內、局位視角的轉換，研究者可以藉此，選擇自己在民族誌中「現身」的程度。

一般而言，人類學家使用的參與式觀察法的關鍵要素包含（Musante & DeWalt, 2011, pp. 5）：(1) 在田野調查地的文化脈絡下，生活一段較長的時間；(2) 學習並使用當地的語言；(3) 積極參與當地人的生活日常及特殊活動；(4) 以日常對話的方式作為訪談技巧；(5) 閒晃（*hang out*），與當地人在休閒活動中進行非正式地觀察；(6) 使用田野筆記進行記錄觀察（通常按時間順序組織）；(7) 在分析和書寫中使用明確與默會的資訊。

呼應參與式觀察法的特徵，Bogdewic（1992）則認為參與式觀察法有以下幾項優點：(1) 研究者的出現不會改變觀察對象的生活模式，研究者融入其中，並不會是田野中被好奇的對象，也因此親眼真實現象的機會相對增加。(2) 在真實與言辭行為差異甚大的時候，參與觀察法更容易瞭解真實行為。(3) 研究問題可以使用社群成員的語言進行詢問。(4) 更能掌握事件之連續性與連結性，有助於瞭解現象的意義，觀察到連續性的脈絡。Kempny（2012）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認為參與式觀察法的優點在於：(1) 研究者對研究的文化很熟悉；(2) 在研

究過程中容易與人建立信任感，讓被研究者感到自在，(3) 能自然地呈現他們日常生活的樣子。

在參與式觀察法中，研究者能在參與當地日常生活的過程中，形成新的研究問題並修正自己的研究假設（Musante & DeWalt, 2011, p. 15-16），也就是說「置身在場」（being there）能夠讓研究者打破、反省自身原有的研究假設，並保有一個開放的心。

綜上所述，參與式觀察法透過長時間的參與觀察，使研究者成為「熟悉」與「深度了解」文化的局內人，以利其蒐集到更接近真實情況的研究資料。而局內人研究者因為與研究對象具有共享的文化（即本研究中的局內人公民記者與受訪者），因而較容易透析、理解、評估當地人特定行為、情感表達背後真實的意義，同時，也能更有效率地提出訪談問題及記錄受訪者回應（Bird, 1987, pp. 7）。

由外來研究者轉變成為社群成員認可的局內人，就有賴於與被研究對象間的日常參與和交流。J. P. Spradley（2016, p. 58-61）綜合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的關係，以及研究者參與田野地日常活動的程度，做為研究者涉入（involve）程度的判斷標準，並據此分為五個參與類型（見表一）。

表一：參與式觀察中的參與類型

涉入程度	參與類型
高 ↑ 低	完全參與（Complete）
	積極參與（Active）
	適度參與（Moderate）
	被動參與（Passive）
無	無參與（Nonparticipation）

資料來源：整理自 Spradley, J. P. (2016).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在極為特殊的情境中，研究者得以完全做為一個觀察者，並沒有機會親身參與，例如：以電視節目為田野，透過觀察劇中角色人物的設定與相處，歸納其中所出現的文化主題與家庭溝通模式，做為反映當代社會文化的途徑。而所謂的被動參與類型，最常見於在公共場合中，對特定場域中的人、事、物進行觀察，研究者和被觀察對象通常不會有所交流、即便有機會交流也相當膚淺，大部分的時候研究者僅是一個旁觀者、觀眾。

適度參與，指的是研究者追求在局內／局外人、參與／觀察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研究者嘗試參與某項活動，但體驗的成分大於日常性的參與。積極參與類型的研究者，在研究初期往往由觀察開始，接著會嘗試參與田野中正在發生的事，以學習此行為隱含的文化規則（**cultural rules**），而非為了獲得內部成員之認可。而完全參與的研究者涉入程度最高，原本就是田野中的內部參與者（**ordinary participant**）。

本研究的核心關懷是，使用參與式觀察法的局內人公民記者，他們的新聞實踐與新聞意理為何？若將參與式觀察放置於公民新聞產製的脈絡下討論，在整個產製過程中，最核心的關鍵就是：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因為要融入在文化之中，似乎違反了新聞傳統上對於客觀性的要求——要求記者和消息來源保持一定的距離（Cramer & McDevitt, 2004, pp. 127）；因此，除了研究者個人的涉入程度外，被研究對象（即受訪者）如何感知自己「正在被研究」的程度，也會影響研究資料的真實性，而Junker（1960, p. 35-40）所提出之參與式觀察中研究者的角色位置分類，更能符合本研究之關懷。

在界定參與式觀察法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時，Junker（1960, p. 35-40）將研究者在田野中的角色，根據研究者的參與程度、研究者身分是否被察覺進行分類，更符合本研究之關懷。他以光譜的形式展現參與式觀察中的研究者角色位置，兩端分別是完全的觀察者與完全的參與者（見圖一）。

圖一：參與式觀察中的研究者角色位置



資料來源：整理自Junker, B. H. (1960). *Field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為一名完全的參與者，研究者原本就是田野中的局內人，其所享有的優勢是：研究情境自然，可以取得相對「可靠」與「真實」的資訊；同時，透過自己的親身參與及經歷被研究者的日常，研究者能夠將自己對於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反應作為對照，去貼近被研究對象的感受；另一方面來說，透過參與也可以看見更多元的視角，幫助研究者發展一個更全面、更深刻的研究詮釋。但做為一名完全參與者也有缺點：首先，研究者可能過度專注在參與的本身，沒有時間和心思去留意身邊所正在發生的人、事、物；此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可能過度親近，導致後者對前者有過度的期待與期望，影響研究者的獨立性（陳向明，2000，頁140-141）。

觀察型參與者的觀察行為沒有完全地被隱藏，但是他會參與被研究對象的各種日常活動，而在那些特別具有歸屬意涵的事件中，如：婚禮儀式中座位與主人翁的遠近，研究者能具體感受自己融入進入當地文化的程度（被視為是哪種程度的局內人）。也就是說，觀察型參與者被當地社群當作是一名「好朋友」的成分，高過於是「偷窺的陌生人」（snooping stranger）（Junker, 1960, p. 36-37）。

而參與型的觀察者，他們的觀察行為大多是公開的，即在特定文化情境下參與活動的每個人，都知道有個陌生人正在觀察。此類型的研究者在其所獲得同意的議題上，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研究自由與資訊蒐集，但同時也代表研究倫理和道德問題會被放大檢視，因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有類似「合約」的關係。

而要成為一名完全的觀察者在研究中是很難真實存在的（Junker, 1960, pp. 37），尤其是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場域中，但理論上他更能專注在觀察的本身，不需要花時間為了融入當地社群而費心於人際交往，但卻也難以精確掌握被研究者行為的意義，也不易觀察到所謂默會知識（陳向明，2000，頁140-141）。

本文將局內人公民記者視為某特定社群的參與式觀察者意義在於，很多時候研究者（記者）受到外部條件的限制，無法選擇自己要成為局內人還是局外人，如研究者的年齡、性別、職業、社經地位、教育程度、文化、種族等，都會影響他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陳向明，2000，頁142）。例如，一名專業記者他在進行醫病關係相關報導時，因為對於醫學知識、語言、經驗上的缺乏，他很難把自己變成所謂的局內人，但如果公民記者本身是名醫生，他就更有可能在報導醫病關係的議題時，就更可能被醫生們當成局內人，因而獲得更豐富的採訪素材。

這種重視「局內觀點」的操作，不僅出現於公民新聞，也能在過往討論新聞室內部多元性（diversity in the newsroom）⁷時被看到，透過聘雇不同性別、種族、社會階級、教育程度的記者，以確保特殊群體，特別是弱勢的聲音以及他們世界觀得以透過媒體傳播出去。記者和公眾都同意，新聞室內部多元性能為社群帶來正面效益，改善少數族裔往往總是在負面新聞中出現、打破特定的報導框

⁷ 1968 年，由美國詹森總統設立《公民暴動諮詢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又稱 Kerner 委員會（the Kerner Commission）的調查報告中，呼籲新聞機構雇用更多的非裔美國人，相信此舉能提供更高品質的少數族裔相關議題報導，透過鼓勵新聞室內部多元性（diversity in the newsroom），即在一個新聞機構之內要雇用不同種族的人，特別是要保障少數族裔，以確保不同的意見和世界觀機會進入到主流媒體的版面。

架、刻板印象；即使在新聞常規的影響之下，少數族裔的記者仍舊能為新聞室帶來獨特的觀點（Nishikawa, Towner, Clawson, & Waltenburg, 2009）。



參與式觀察法，正是人類學家為了從「內部人」的觀點來了解一個文化，試圖解決民族中心主義所產生的文化偏見及歧視，並跳出民族中心主義與文化相對論之中的二元對立的主要途徑。對於特定社群具有深度觀察的公民記者，就是參與式觀察中的研究者，援引Junker（1960）提出之研究者於田野中的角色位置，就是希望能於此理論基礎之上，更有系統地刻畫、深度描繪公民記者的公民新聞實踐與影響其新聞意理的原因。

這群局內人公民記者，除了使用參與式觀察法之外，另一項與專業記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的「草根」姿態，這不是對其報導能力好壞的預判，而是強調他們因不受雇於任何媒體、接觸新聞專業訓練的管道相對不那麼正統，因此有機會透過報導，展現更強的自主性與社群意識。這與本土人類學家之於人類學的概念不謀而合，因此本文將接著回顧本土人類學家的概念及雙重處境，以利後續發展本研究分析架構。

貳、 本土人類學家的雙重處境

文化人類學逐漸成為一門學問，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帝國主義時代，因應歐美列強對海外殖民地管理所需，需要大量接觸異文化，包含不同的民族、語言、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等等，而需要發展出一門學問，以了解這些差異，才能進一步創造白人至上的基督教宇宙觀，以方便統治（黃樹民，2011）。縱使隨著時間發展，人類學漸漸脫離殖民時代的思維，並致力於呈現被研究對象的在地觀點，但解釋文化的主體終究仍是研究者自己，這些被記載在民族誌中的內容，並非真正的「本土歷史」（native history），而是一種代表主流學術圈及不同族群的異己論述（discourses of otherness）（張隆志，1997，頁262）。

本土人類學家正是人類學界反思其以「土著的代言人」自居，卻導致土著無法自我發聲的脈絡下所誕生的概念。本土人類學家的定義，簡言之就是研究者受到一定的人類學訓練後，以局內人的身分對自己所屬之文化進行研究（Jones, 1970）。

Fahim and Helmer（1980）認為，本土人類學家的身分，會讓他們在從事人類學研究時不時地陷入局內／局外觀點的困境，這個雙重身分在認識論、方法論和意識型態上都對本土人類學家產生影響。因為他們不只是一個執行研究、發展理論的專業人士，還是一個能蒐集到那些「局外人」所無法觸及的資訊的「局內人」（Jones, 1970, p. 252-253），也因此自然地在田野資料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上掌握絕對的優勢，更能夠真實地詮釋本土文化中，難以捉摸的思想與情感（Lowie, 1937, pp. 133）。

身為一名非裔美籍人類學家Gwaltney（1976）表示，自己黑人的外表，在訪談過程中隨時隨地都很重要，而他所認識的所有在地人都同意這個說法。因為同樣作為一名黑人，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共享了部分的生命經驗，例如：遭受歧視、成長環境相對貧窮，身為特定社會情境下的弱勢者，讓研究者不由自主地企圖參與、貢獻某部分的解答（Jones, 1970）。Gwaltney認為本土人類學者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去汙」（decontamination），增加在地人／原住民（native）在人類學訓練上的投入，能夠幫助人類學消去過度浪漫化的傾向。這種浪漫主義，主要源自於各種權力關係不對等所形成的世界觀，也就是說，外來的人類學家雖然嘗試用人類學的知識體系去進行分析，但仍會受到自身文化中，不被認為是知識的「先見之明」所影響。許多外來的人類學家，甚至從來沒有問過被研究對象他們真正渴求的是什麼？他們希望自己的後代子孫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就一廂情願地替研究對象代言（Jones, 1970, pp. 258）。但一名本土人類學家就更能自身文化中，分辨、覺察到這些先見之明如何影響他成為一個人類學家。

身為特定社群中的局內人，公民記者在報導自身社群相關議題時，享有怎麼樣的採訪優勢、如何呈現局內觀點、是否有不由自主想追求解答的使命感，甚至進一步透過其公民新聞實踐，激起專業新聞從業人員反思其既有的框架，這些都是本土人類學家的特徵，可用以做為捕捉局內人公民新聞實踐的指南，以利後續分析、討論他們新聞意理的內涵。

此外，本土人類學家存在的意義，不在於他們能提出一個「更好」的觀察或洞見，而是在於「不同」(Jones, 1970, pp. 257)。而這些「不同」就有賴本土人類學家在研究過程中持續地梳理、調整他的位置和身分，以及反思他該如何在田野現場及學術場域之中自處、進行自我批判 (Hastrup, 1993; Narayan, 1993)。

林徐達 (2011, 頁 166-172) 以「Lahuy 返鄉口試」為例⁸，具體點出本土人類學家所面臨的是一種「族群自我 (ethnic self) 與批判他者 (critical other)」的雙重處境。作為精通族語與漢語的泰雅族青年 Lahuy，他儼然成為兩方文化的中介者，同時背負著兩造文化熱切的盼望，反映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同謀」(complicity) 關係⁹：一方面是做為人類學者對學術的貢獻，另一方面又得面對被研究者的期待，研究者在田野的位置與處境因而浮現。研究者向當地人學習、請教他們的文化，同時在當地人對外面的世界感到困惑時，研究者也有責任提供文化他者 (cultural other) 的觀點；Lahuy 作為自身文化的代言人，乘載了比「外地」研究者更多的部落情感，如何誠實地面對來自文化身分的情感、又同時保有批判原生文化的勇氣，這些都讓本土人類學家的「自我書寫」變得更加的複雜。

⁸ Lahuy, Icyeh (拉互依·倚芥) 以「是誰在講什麼樣的知識—地方知識實踐與 Smangus (司馬庫斯) 部落主體性建構」為題進行其研究所碩士論文之撰寫，並且回到部落中進行畢業論文之口試，口試的過程中，他以族語進行報告，並開放部落成員進行提問及發言。蕭戎 (2008) 稱這是一項：「在地的被研究對象——其實亦是研究知識的共同建構者——得以清楚地發聲與被看見。」的創舉。

⁹ Marcus (1998) 提出「同謀」的概念，取代傳統人類學描述田野工作者與報導人的「互惠」關係 (rapport)。在同謀關係裡，田野工作者與報導人發展出一種互相需要、彼此依存的關係，而非田野工作者為獲取資料單純受惠於報導人。在這個時候，人類學家逐漸察覺到自身與研究主體二者共同存在的雙重身分，研究者在田野的位置因而浮現，而不再是單純的「局外人」(林徐達，2011, 頁 165)。

回應受制於族群情感和學術訓練的雙重處境，林徐達（2001）認為本土人類學家應以文化諮商者的角色，抱持著他的族群同理心，以部落權利為使命，向局外人深描¹⁰地方知識最難以理解的文化現象、規範與情感。他認同 Geertz（1995, pp. 94）的說法，即相較於「抽離、客觀」的學術要求，Lahuy 應該要承認其族群身分所帶來的情感，並「向外界說明此份族群情感正是外來者難以覺察的細膩文化感知（頁 172）」，以達到 Geertz 口中所謂的「同時生存於兩種專業要求之中」。

正是這種在局內與局外觀點間徘徊、拉鋸的現實，使得人類學家不斷地保有反身性意識。誠如林開世（2016）所言，人類學家身為參與在地日常生活中的研究者，往往會發現自己無法輕言地歸類研究主體，因為在社會互動中的每一個人，都因為不同的情境而選擇不同的主體位置，社會角色身分的多重性確實存在，「人們也許可以在某一個時空點，接受或擁護某一種主體位置，但這種可被你找到的位置，並不等於他們就可以被這種主體性所鎖定（頁 88）。」而這種主體性的不穩定及不可確定性，正是人類學學科獨特的貢獻。由於意識到主體位置的流動性與開放性，也讓人類學在企圖追求一個對文化全盤性的理解的終極目標下，無奈但誠實的接受：民族誌的書寫僅是一種部分的真實（Clifford & Marcus, 1986），而不至於落入絕對客／主觀的二元對立中（林開世，2016）。

而這種研究者位置及與研究對象之間關係的問題，同樣出現在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Durham（1998）反思新聞實踐中的客觀性原則，認為其淪落為一種形式上的相對主義，違反了新聞初衷。他提倡根植於「立場認識論」強客觀性（strong objectivity）¹¹以反擊「知識洪流」所帶來的相對主義和至高無上的客觀

¹⁰ 所謂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重點，就是要將事物現象放在文化脈絡下（Geertz, 1973, pp. 73；轉引自林徐達，2011，頁 152），釐清意義的結構，其強調的是一種對研究現象進行整體性、情境化的動態描述（齊力，2005，頁 14）。

¹¹ Durham 借用了女性主義學者 Harding（1991）提出女性主義立場論，認為越是身處弱勢地位的女性，就更具有一種知識立場的特權（the epistemic privilege），越能掌握社會整體關係的全貌（吳秀瑾，2005，頁 653）。他提出強客觀性，即強調一種反身性的客觀，從要屏除一切偏見轉向承認偏見，將其脈絡納入科學結構的思考中。



中立 (pp.126)。他認為記者應該有目的性在報導中引入主觀觀點，特別是邊緣族群的觀點，記者透過置身於邊緣團體的位置，去反思自己在寫作過程中如何有意、無意地對弱勢團體進行他者化。而實際操作上，記者將從有利邊緣化群體的位置接近報導，以抵消主流新聞媒體的主導觀點，作為實現更高層次客觀的一種策略，而這些客觀就是建立在準確、局內人觀點以及豐富的描述之上，和人類學中旨在呈現局內觀點的民族誌內涵不謀而合。

根據本章第一節，公民記者的新聞實踐中，主觀敘事的比例確實較高，也不完全遵守客觀性意理的寫作規範。那麼對於這群局內人公民記者而言，他們是有意識地選擇「強客觀性」的報導立場，還是單純因為沒有接受過相關的新聞訓練，也屬於本研究所關心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範疇。

本土人類學家與參與式觀察法的引入，除了是更貼近於公民記者的身分，以及其新聞實踐的特徵外，更進一步地點出了「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影響研究者的專業意識形態，並呈現於最終的知識產品中。本研究旨在了解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以及影響其意理形塑的因素，身為所報導議題中的局內人，公民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自然也就會對其新聞意理的形塑造成一定的影響。



第三節 小結

據第一章所述，我國的公民記者中，存在著一群具「局內身分」的公民記者，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所報導議題中的「關係人」，甚至是當事人。這挑戰了傳統新聞專業意理中的客觀性意理，甚至打破過去記者與受訪對象之間關係的想像。本章進一步爬梳相關文獻，發現現有研究也表明，我國公民記者的新聞實踐上與傳統新聞學的確有所差異（林宇玲，2015；孫曼蘋，2009），如：客觀性意理、報導類型，報導敘事中使用之人稱、事實／意見有無分離，或是在新聞寫作中多採重點分散式的寫作，而非傳統的倒金字塔等……。

不過，在文獻中，卻鮮少有人針對公民記者新聞意理以及影響其意理形塑之原因進行研究。意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長時間累積、會不斷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所交往的人、事、物所影響的價值體系，並會具體化成為行動的準則。對記者來說，新聞意理就是指其對職業角色與媒介功能的一種信念系統；成為新聞產製各階段的價值判斷依據，並展現於最終的新聞產品裡。

2008 年，陳順孝提出——若以「本土人類學家」去理解公民記者，更能發現公民記者的角色價值。本文取經至此，也從現有文獻中發現，人類學與新聞學同樣關注於對人、事、物的再現與詮釋，在資料蒐集、書寫跟認識論上，是可以相互參照的。而本土人類學家在人類學上的意涵，與公民記者之於傳統新聞學，則有異曲同工之妙——原本來自第三世界、部落、或是處於弱勢的群體如：黑人、女性，開始接受人類學學理訓練，而後對自己所屬的原社群、原文化進行研究。

此外這群局內人公民記者的身影，亦能現有文獻中被發現，除了公民記者的來源外，他們的報導多取材自：生活周遭所見所聞、長期關心之特定議題、個人職業、族群身分、社區／鄉土情懷（王晴玲，2007；林宇玲，2015；孫曼蘋，2009；蕭博仁，2009），因此其報導往往帶有對特定社群、議題關懷的色彩。本

研究認為，這些關懷的萌芽與存在，就與公民記者們的生命經驗、所身處的社群息息相關。



身為本土人類學家的公民記者與傳統記者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前者對特定議題的參與程度、情感涉入深度高，他們使用參與式觀察法，長期融入在其社群與文化中，並從局內人的角度出發報導自己所身處的社群。對社群參與和情感羈絆程度的差異，會對這群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產生什麼影響？是否會使公民記者同樣面臨本土人類學家在——「族群自我／批判他者」的雙重處境？

意理研究做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研究，自然無法與主體（公民記者）切割，可惜的是當前台灣對於公民記者的相關討論，多依附在公民新聞的平台研究之下，相對於公民媒體及公民新聞，理論內涵較不足（陳楚潔，2016），多停留在靜態、表面的特徵與現象之敘述，亦缺乏對公民記者個人，及其對自身角色認知與媒介功能理解的深度描繪。

蔡孟珊（2010）討論 PeoPo 平台上高參與度公民記者的發文頻率、報導主題、使用的報導型式（影音／圖／文）等，歸納出公民記者報導的特色，並透過訪談中歸納出他們選材的因素，包含：生活與工作、個人喜好、所屬族群的議題取向、認同地方與保衛弱勢的心理等。不過，因研究旨趣不同，她並沒有將上述原因，與公民記者的主體生命經驗做更深入的說明。陳楚潔（2016）以 PeoPo 公民記者為研究對象，討論公民新聞傳播賦權的過程與效果，發現公民記者更強調報導要立足於日常生活與常民經驗，因此有更強的社群意識、地方認同。她也發現 PeoPo 所提供的講座、公民記者之間的互動，皆會影響公民記者對新聞功能、記者角色的認知，這也有助於本研究訪談大綱的發展，但仍缺乏對於公民記者生命經驗與其新聞實踐的扣連。



國內以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為主題的研究，僅見於洪婉甄（2009）的〈公民新聞學專業意理：挑戰與建構〉一文。她利用修正式德菲法發放問卷，調查公民記者所認知的專業意理，驗證傳統新聞專業意理是否也為公民記者所接受。研究結果指出，即時性、衝擊性、顯赫性、衝突性、異常性等傳統新聞價值，是這群公民記者少數都不認同的項目；她進而訪問公民新聞領域的專家，亦取得他們的肯認。然而，儘管公民記者們皆認可客觀中立性的重要，卻與他們的實際作品有所違背，專家亦表示客觀中立不該成為侷限公民新聞產製的因素。此研究成果雖然指出公民記者意理的特殊性，卻沒有提供更有脈絡、有系統的解釋，再者，直接以傳統新聞專業意理為框架，放置於公民記者們身上，忽略了他們做為新聞實踐主體行動者的自主意識與特殊性。

本文認為，公民記者從被動的閱聽人轉變成行動者的歷程，並非單一時間節點上的轉變，從工作坊或其他管道接觸到「公民新聞」的概念，不會讓人人都變成公民新聞的貢獻者。故本文以為，不同於職業記者受內規和專業訓練的影響較深，公民記者個體獨一無二的生命經驗、長期培養出來社群認同，才是影響其意理與實踐的重要因素。而這群公民記者應是詮釋其新聞實踐的主體，但現有文獻中，對其新聞意理的討論僅限於現象描述，少有深入探討其脈絡形成的過程，亦缺少以公民記者為主體的研究，是以無法對公民新聞意理的特殊性、公民記者的價值有更深入、超越的認識。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銜接起公民新聞學倡議之理想，與公民新聞實踐的實證研究，引入人類學「本土人類學家」做為參照，期許凸顯公民記者在後真相時代的價值。

第三章 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問題



綜合文獻回顧可見，有一群公民記者符合參與式觀察法中局內人的特徵；然而，不同於專業記者的意理型塑，受到受雇媒體內部新聞常規的影響，公民記者們並未受雇於媒體機構，也沒有編輯室內控審查，不禁令人好奇——什麼是影響公民記者意理型塑的關鍵？

因此發展出本文的研究問題：局內人公民記者，如何形成他們的新聞意理？有何異同？

本文研究對象之主體——「局內人公民記者」可以由社群自我以及記者專業我兩個視角切入。故要回應本研究問題，必須了解其社群自我與記者專業我建構的歷程，包含：一、局內人公民記者的初始動機，他們如何從被動的閱聽人變成一個公民新聞的行動者？經過哪些培力？二、局內人公民記者，如何發展出對特定社群／議題的關懷與認同？參照本土人類學家的概念，他們是否也面臨同樣的雙重處境？如何面對？

這群公民記者展現出怎樣的新聞意理？又有何異同？首先，對於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探索，著重在三點：(1) 他們新聞本質的認知？（事實與真實）；(2) 他們如何挑選報導題材？（新聞價值）；(3) 他們對於客觀性意理的認識為何？包含他們是否認同正反並陳、第三人稱敘事、區分事實與觀點的作法。

其次，本文將會利用 Junker（1960）分析研究者在田野中角色位置，進一步將局內人公民記者分為「觀察型參與者」及「參與型觀察者」這兩類，歸納、比較他們新聞意理的異同。前者代表，研究者在田野中參與涉入程度深，研究者身

分雖未完全被隱藏，但總體而言較不影響被研究對象的真實行為；反之，後者的參與涉入程度較低，被研究對象能察覺自己正在被觀察。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意理研究作為一種價值觀、意識形態研究，屬於理念型分析，雖然本文將其分為兩類來進行討論，但實際上這更偏向光譜的概念，即公民記者們可能兼備兩種特質，只不過更偏向某類的特徵。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透過局內人公民記者的自述，掌握他們從閱聽人變成公民記者的歷程，並探討此一歷程中有哪些關鍵、如何影響他們意理的类型與新聞實踐。

深度訪談法屬於質性研究方法，為提升研究品質，偏好透過不同的資料收集與詮釋、分析的方法，達到三角檢驗（triangulation）的目的（齊力，2005，頁13）。故在研究初期，研究者透過大量閱讀公民記者於 PeoPo 發表的作品、公民記者個人背景介紹的間接資料，觀察研究對象可能身處的社群；第二階段則是更細緻地觀察研究對象的報導中，涉及他們「局內身分」的相關報導，從此發展訪問提綱，而後使用深度訪談法以獲得訪談資料。研究後期，則透過與公民記者的訪談內容與報導進行交互驗證與分析，並針對可查核的客觀事實，進行確認。以下針對深度訪談法進行回顧，並說明本研究如何利用深度訪談蒐集研究資料。

深度訪談，是一種透過有目的性的雙向對話，讓被研究者在過程中可以用自己的話，闡述自己的價值觀、感受、經驗及行為（Minichiello, Aroni, Timewell, & Alexander, 1995），處理計量方法難以處理的問題，例如本研究的核心關懷：意義詮釋——透過被研究者的敘述或其提供的文本，研究者可以了解行動者對行動賦

予的主觀意義 (subjective meaning) (齊力, 2005, 頁 9-10)。特別適合用來「蒐集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胡佑慧, 1996)。

在執行深度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要創造一個尊重與平等互動關係，讓研究對象能自在地將研究現象與行動還原，研究對象可以自行決定願意表露的程度 (潘淑滿, 2003)。研究者有責任要判斷受訪者的回答是否足夠、哪時候要介入去說明、澄清特定談話內容，但同時應避免提供個人意見或是對受訪者談話內容進行價值判斷 (Della Porta, 2014, pp. 229)。

而訪談又可分成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及無結構式訪談，代表研究者可控制的程度從最高到低。結構式訪談有統一問題、提問順序，以及一致的回答記錄方式；而在無結構式訪談中，研究者扮演的僅是輔助角色，只需粗略的提綱或要點，再隨著受訪者的回應靈機應變 (林淑馨, 2010, 頁 226)。半結構式訪談中，通常研究者會研擬概略的訪談提綱，並根據訪談中的互動具體調整訪談的程序，鼓勵受訪者積極參與 (陳向明, 2000, 頁 171)。用 Mason (2002) 的話來說，就是研究對象與研究者基於對一個主題有共同興趣而自然展開對話，在理想狀態之下，這個對話過程是令人感到放鬆、誠實且開放的。研究者必須擱置自己的先見，引導受訪者用自己的話，抒發自己所認為重要的生活經驗 (高淑清, 2008, 頁 116)，透過深入了解研究對象所身處的脈絡，以他的觀點來分析其所敘述、經歷過的生命故事 (潘淑滿, 2003)。

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是：局內人公民記者，如何形成其新聞意理；因此，研究對象應是賦予自身行動意義的主體，是故，本研究採納陳向明的說法 (2000, 頁 171)，在訪談初期使用無結構式訪談，讓受訪者可以使用自己熟悉的話語，闡述他們自己認為重要的問題、看待問題的角度與對意義的解釋；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再使用半結構式訪談，對想要深入了解的事情進行詢問，不會刻意堅持問題的回答順序。

此外，在本研究設計中，首先為了幫助受訪者回到新聞產製實務的情境，並自述影響自己的關鍵事件，故會使用描述性問題（descriptive question）的訪談技巧，目的就是讓受訪者能開打話匣子，讓受訪者能用自己的語言展示，最常使用的技巧是延伸問題，引導受訪者使用他習慣的局內人的語言，增加他對對話的熟悉度，同時也展現研究者「告訴我越多越好、越仔細越好的渴求」（J. Spradley, 2003）。

透過事前蒐集各公民記者相關訪談資料，包含：PeoPo Webcast 中的公民記者介紹、客座總編輯紀錄、PeoPo 公民新聞獎得獎感言之影像記錄、PeoPo 教育資源網¹²中的公民記者經驗、PeoPo 在「議」起地方公民記者聚會、網路其他可得報導等，根據公民記者之經歷、觀察其報導主題，在上述二手資料的基礎之上擬定訪談大綱的題組。實務操作上會根據每一個公民記者，規劃個別化的訪談大綱，以利回應本文的研究問題。根據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發展出三大面向的未個別化訪談大綱（見表二）如下。

表二：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料與社群自我	
基本資料	• 出身背景、家鄉、求學、職涯經歷、族群身分
社群認同	• 為什麼你會特別關注〔 〕議題？何時開始接觸、原因、關鍵事件
二、新聞專業我養成歷程	
新聞素養養成	• 如何接觸到公民新聞？為什麼後來決定投入？ • 報導的相關技巧你從哪裡學？什麼時候開始學？ • 當公民記者的過程中，有何階段性的轉變？為什麼？

¹² PeoPo 教育資源網：<https://www.peopo.org/events/elearning/D3.htm>

行動者與記者身分	• 你會看新聞嗎？有什麼感受？（過往的閱聽人經驗） • 你覺得新聞的功能應該是什麼？ • 曾經想過要當記者嗎？想當一名怎樣的記者？ • 這麼多的作品中對你印象比較深刻的報導是什麼？為什麼？ • 自己除了公民記者的身分外，還是什麼社群的行動者？ • 做公民新聞對有影響你對社群行動的參與程度嗎？
三、報導實踐與新聞意理	
報導的優勢與劣勢	• 你長期關注〔 〕議題，那麼多年了，採訪的時候對你有什麼樣的影響？（受訪者來源、與受訪者的關係；對議題熟悉度／切入視角） • 在你的採訪經驗中，有沒有擔心過：自己的報導，對他們有負面的影響？或是擔心他們看到報導後會不諒解？你最後是選擇怎麼做呢？為什麼？
新聞查證	• 你會透過哪些方法確認受訪者說的內容是不是真的呢？對於沒有辦法確認真實性的說法，你通常怎麼處理？
新聞價值	• 報導的時候你會怎麼挑選題材？ • 怎樣能算是一則好新聞？為什麼？ • 你心中預設的觀眾是哪些人？這群觀眾和看主流媒體的觀眾有沒有區別？對你的報導敘事方式有什麼樣的影響？為什麼？
新聞客觀性	• 在報導爭議事件時，你通常都怎麼處理？ • 你在報導〔 〕的時候，你是怎麼看這個議題（立場／意見）？這對你的報導方式有什麼影響？
價值觀／反思	• 報導完成後，社群成員的反應是什麼？他們會給什麼樣的回饋？你們是否會有不同意見？你的感受為何？ • 有沒有哪一個受訪者／新聞事件，在你採訪後，改變了你之前的一些想法？ • 擔任公民記者對你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第三節 研究對象



基於研究旨趣，本文以局內人公民記者為研究對象。不同於突發性新聞事件中，公民恰巧發揮目擊功能，從事「一種隨機的新聞行動」(random act of journalism) (Lasica, 2003)，本研究更關心局內人／本土人類學家的公民記者們，更深刻、常態化的新聞實踐。此外，呼應本土人類學家定義：研究者通過人類學「學科」訓練後，回到原文化進行研究，故以本研究從國內最具規模¹³，且設有專職人員進行企劃、培力活動¹⁴的「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挑選合適的研究對象，又 PeoPo 以影音報導為特色，相對於文字報導，影音新聞不論是產製技術門檻及採訪侵略性都更高，是以，公民記者需有更強烈的參與意願、更需與受訪者建立信任關係，亦吻合本土人類學家設定。

本文旨在研究，這群公民記者如何形成其新聞意理。PeoPo 以公民為發聲主體，並不會針對公民記者上傳之內容進行事前審查¹⁵，使公民記者可以自主選擇報導方式、報導主題，更能展現公民記者對於新聞常規的詮釋與實踐；而這種自由、開放的環境，讓公民記者面對「局內人」及「記者」雙重身分發生矛盾時，得以忠於其真實意志。

在進行質性研究時，每一位受訪者都是獨一無二的，並不強調普遍性的類推，而是要從中發掘認識世界的新可能性（陳向明，2000）。故本研究透過 PeoPo 平台，找出曾獲頒各式公民新聞獎肯定又符合參與式觀察法定義，即對特定社群有長期關懷、深度參與，報導又多以此社群為題的公民記者中，挑選各具「不同

¹³ 截至 2019 年 4 月 21 日，註冊成為公民記者人數已達 10453 人。

¹⁴ PeoPo 設有線上學堂，教學主題多元，從技術性的畫面拍攝、現場收音、配音、剪輯等，乃至於如何進行新聞議題發想、如何報導爭議性議題等，都有相關資源可供公民記者參考；每年舉辦數次的蹣拍活動、地方性記者聚會、與社區大學、大專院校或非營利機構合作。

¹⁵ PeoPo 設有「公民新聞平台使用規範」、「公民記者自律公約」，同時由公民記者彼此互相進行監督，採社群共治，設有檢舉機制，雖不進行事前審查，但編輯台最終有權刪除違規報導，詳細內容可見：<https://www.peopo.org/events/about/P2.htm>，<https://www.peopo.org/events/about/P1-6.htm>。

關懷、身處不同社群」的公民記者，讓研究對象能更具多元性，也豐富本研究的內容。最終受訪名單如下（見表三）：



表三：受訪者名單

受訪者	公民記者 名稱	社群身分	報導議題	得獎紀錄
Valjeluk Katjadrepan	來義鄉 久拉卡拉久 部落推展協會	部落文化保存工 作者、族語教師	原住民議題、 排灣文化	2009 感謝獎 多次獲頒原民台獎項
洪春景	欖仁居 修行生活網	定居台東關山 抗暖化志工、 種樹農夫	南橫公路、 花東在地議題	2018 新聞專題 2017 特別獎 2016 新聞專題 2011-2014 新聞專題 2011 感謝獎
吳慧君	彰化縣 環境保護聯盟	彰化鹿港人 環團執行秘書	環境保護、 土地開發	2013 感謝獎
陳本康	阿 Ben	應用地質技師 水土保持技師	地質、水文、 水土保持	2012 新聞專題組 2011 感謝獎、特別獎
陳治安	傑利	客家人 生態環境愛好者	客家文化、 生態環境	2016 新聞專題 2014、2011 短片報導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討：局內人公民記者，如何形成他們的新聞意理？有何異同？本文之研究對象為對特定議題／社群有長期關懷公民記者，於此共同特徵分析，他們都屬於「本土人類學家」；但若更細緻地，針對他們在田野中參與觀察的角色位置（Junker, 1960）加以討論，仍可以發現這五位公民記者，在採訪現場與報導立場上，呈現了從「參與者」到「觀察者」的程度差異，他們與受訪者之間關係的親疏遠近，導致他們形成不同的新聞意理。

是故，本章第一、二節中以「觀察型參與者」及「參與型觀察者」做為分節依據，以深度訪談為基礎，讓五位受訪者各自敘說自己與所屬社群的關聯，以及公民記者生涯的歷程：自身與社群的關係／連結、為何踏入公民新聞領域、經歷哪些培力、報導實作策略的詮釋以及對新聞工作與記者角色的認知，進而從中梳理出較為抽象的新聞意理。第三節，研究者再從訪談內容中總結，立體化其新聞意理，進一步的詮釋分析、比較這兩類公民記者的異同。

第一節 觀察型「參與者」

「觀察型參與者」的公民記者，他們在處理自己社群所屬的新聞議題時，不論是採訪現場或報導安排，主動「參與」程度會大於客觀「觀察」，受社群認同羈絆的影響程度高，多採有利社群的角度報導，重視社群成員的反饋；在採訪現場，帶有社群內部成員的「身分標籤」，以本文研究對象為例，即原住民自己報導部落議題、水土保持／應用地質技師做專業領域的報導，或環保運動工作者報導環境新聞，他們參與社群「日常」的頻率更高，長時間的置身於採訪現場，其局內身分，讓受訪者得以卸下心房，甚至會忘記有他人在拍攝、紀錄。

壹、 公民記者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推展協會－Valjeluk Katjadrepan

Valjeluk Katjadrepan（巴勒祿戈•卡甲日班，後簡稱巴戈），1953 年生於屏東縣來義鄉南和村久拉卡拉久部落，畢業於屏東農專的獸醫系（現已改制為屏東科技大學），曾任來義鄉鄉民代表，現任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理事長、族語支援教師、全職的部落公民記者。雖然正規教育與新聞或社會人文無關，但 1980 年代起的原運氛圍及原住民族政策、自身族群認同與傳承部落文化的使命感，讓他毅然決然 41 歲的壯年，放棄從事 15 年的穩定工作，考公共電視籌備處的原住民記者，完成培訓後，他短暫服務於主流媒體，卻在新聞實務現場發現，那樣的環境無法滿足他擔任記者的初衷。回到部落從事排灣族文化記錄、原住民議題報導已超過 20 年，巴戈認為只要是真實的資訊、心聲，他願意做原住民族傳聲筒，但並不是以反對政府的姿態，而是自許做部落與外界間的橋樑。

社群認同：排灣族認同及原住民主體意識

屏東來義鄉是我國排灣族最多的鄉鎮¹⁶，排灣族人口占人口總數的 93.52%，於此出身、成長巴戈從小就浸染於排灣文化中，身為最後一代曾在幼時住過高山，後遷居平地的族人，他更有感於原住民傳統生產方式在現代社會所面臨到的挑戰，以及後輩族人與自身文化的疏離，受到 1980 年代起我國風起雲湧的原住民族運動影響，他開始思考能為自身族群做些什麼？做為部落內恢復原住民姓氏¹⁷的先驅者，巴戈對排灣族的身分認同與原住民族集體權益的關心可見一斑。

我的名字 Valjeluk Katjadrepan，漢譯的話就是巴勒祿戈•卡甲日

班，……，我身分證上的名子在 20 幾年前就改了，民國八十幾

¹⁶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原住民族人口數統計資料－1084 年閩縣鄉鎮市區原住民族人口－按性別族別】。取自 <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40F9579765AC6A0&DID=2D9680BFECBE80B65CC45726A38AF46C>

¹⁷ 1995 年立法院通過《姓名條例》修正案，原住民終於可於身分證上使用族名。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為止，恢復原住民族族名的總人數為 2 萬 6,214 人，僅佔我國原住民族總人口 56 萬 7,502 人中的 4.62%。

年。……我們本來就有自己的名字，所以政府在允許恢復之後，在第一個時間我就申請恢復，我那時候還是鄉民代表，所以更是要率先。



1990 年初，原運論述出現轉變，部落主義（tribalism）倡議族人放棄都市抗爭路線，回到部落進行歷史、文化、語言等記錄工作。搭配上當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已改制為文化部）強調在地觀點、社區意識、重視族群文化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行，形成一股讓回到部落從事文化復興的原住民部落自主運動（海樹兒·戈刺拉菲，2006：259），而巴戈的經歷正好也呼應上述背景。

其實在恢復族名的前一年，巴戈才剛做了一個掙扎，但回頭看仍是「選對了」的決定。1994 年 8 月 31 號，41 歲的巴戈申請優惠資遣，離開服務 15 年、人人稱羨的台糖畜牧獸醫鐵飯碗。隔天，巴戈就北上至公共電視籌備會受訓，為了實現排灣部落文史紀錄的夢想，成為全台首屆原住民記者培訓班中 24 名原住民代表之一。這個決定並非偶然，因為早在擔任畜牧獸醫的期間，巴戈就利用假日拍攝部落裡各式活動，「不做記錄好像就是很空虛那種的（感覺）」，他形容記錄部落文化，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和他學生時代就愛寫日記一樣，只不過「拍攝會比手更寫快一點」。

培力歷程：築夢開始－新聞理想與實務工作中落差

培訓過程中，學員們有系統地接受新聞相關訓練，包含基本的器材使用、新聞寫作、傳播理論以及原住民族相關議題如：土地、勞工議題（陳淑美，1994），巴戈自述這是他正式接觸新聞工作的起點。結訓後，他短暫擔任公視南區特約採訪記者，1997 年至台灣第一家有線電視新聞頻道《真相新聞》，負責高屏地區的社會新聞，但因主流媒體截稿的時間壓力，讓他在無法實現做完整「記錄」的個人理想，最終於兩年後萌生退意，放棄當年七萬元高薪的記者工作。

跑社會新聞有一個很不好的地方，就是你有時間的限制，……，你只能夠那個擷取一些畫面，再配一些旁白，所以總是有很不甘心就離開現場的感覺，那不是我要的模式，因為我要的是做一個完整的紀錄片。



離開《真相新聞》後，巴戈先後進入《中國晨報》及第一份由原住民自辦發行的全國性報紙《南島時報》¹⁸，同期間也開始接觸原住民族電視台，不過最終他還是不習慣那種應付上級的感覺，選擇離開職業記者的工作，回到部落成立屏東縣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並兼任理事長，以便能更專注地記錄、傳承排灣族部落文化，開始了他的獨立公民記者生涯。

社群使命：族語傳承的當仁不讓

1953 年出生的巴戈，對部落文化傳承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因為他這一輩，是能自如地使用族語的最後一代，一來與部落耆老的溝通流暢，二是成長歷程更能體會排灣族的文化底蘊，自然無法對自身文化的消逝置之不理。

現在我都 60 幾歲了，60 幾歲剛好也算是熟悉我們部落文化的年齡層。那比我們年輕的，都沒辦法做很完整的闡述、敘述，因為比我年輕的他們只會講國語或者是講台語，那族語部分他們能力就比較弱，所以沒有辦法全部接收我們更長一輩的文化洗禮，他們是感受……不會說完全感受到，那更何況是祖孫輩。

2001 年 11 月，原民會發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巴戈隨即報考首屆族語認證，成為族語支援教師，到南和國小、七佳托兒所及在地高中教學，甚至曾在部落開設族語課程，而 PeoPo 平台上的族語報導，也是要推廣族語教育。

鑒於族語教學之急迫性，……，和身為原住民的使命感，擬集合部落內

¹⁸ 《南島時報》創刊目標為：(1) 尋找台灣真實面貌；(2) 還原福爾摩沙淨土；(3) 復振本土多元文化；(4) 營造獨立自主經濟；(5) 重振南島民族尊嚴。

[不同成員]，成立文化推展敢死隊，促使族語生活化、族語教育簡單化，拍攝成系列作品透過 PeoPo 平台分享給全國同胞。(引自 2009 年 9 月 26 日，《當我們在「議」起—台東地方公民記者聚會¹⁹》巴戈投影片之內容)



巴戈認為部落文化的傳承，可以使用全族語採訪就是他最大的優勢。2006 年至 2009 年間，巴戈多次參加原民台委辦的原住民族電視節目製作工作坊以及徵件活動，並曾獲得社會組的首獎。

公民新聞的起點：八八風災——外人不來，我就自己做部落的發聲筒

2009 年 1 月 25 日，巴戈以「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推展協會」登記成為 PeoPo 公民記者，同年莫拉克風災（又稱八八風災）重創南台灣，來義鄉正好是重災區，巴戈形容「好像整個人都動了起來」，因為災難就發生在最親近的部落與族人身上。八八風災剛發生時主流媒體一窩蜂地來，他要擠都擠不贏，卻只有三分鐘熱度，不會花成本來到屏東做後續追蹤。

其實是從八八之後，我就覺得更不能放棄這個（公民記者）工作，因為我們部落一旦有什麼災害的話，一般主流媒體根本不會來，只有靠我們自己這個部落的傳聲筒，才可以發聲，還好現在有所謂 Fb、公共電視的公民新聞平台，不然我們部落裡面的大大小小事情，就只有我們部落裡面的人知道。

回憶起八八風災及隔年的九一九凡那比颱風，巴戈說他都是雨還在下、風還在刮就開始拍，邊拍也邊聯絡搶救。「不論是圍觀者或是災民，都把我們當成英雄來看，有的人是救災英雄，而我們是紀錄的（英雄）。」

¹⁹ 取自 <https://www.slideshare.net/scifisam/ss-2077966>



報導實作：局內人視角的風災報導

2009 年 8 月 8 日一早，巴戈上傳〈南和部落岌岌可危〉²⁰的影音，呈現力力溪溪水暴漲、沖毀河堤，村民擔心的景象。除了第一手的災區資訊外，巴戈也提供不同於主流媒體的報導框架，身為局內人的他，看見排灣族人在災難時刻相互扶持、發揮部落互助的自立精神，而非形象悲苦的被動等待救援。他的報導也凸顯了小型地方性團體、組織對災區重建工作的付出，在主流媒體上，這些單位可能因為捐款金額太小、不具知名度而沒有被報導，但對在地災民而言，這些社區型團體的協助，常比大型慈善機構或是政府補助來得更及時。8 月 22 日上傳的系列報導²¹中，就描述了來義鄉內的地方型團體偕同社區幹部與耆老 40 多人，一同將所募得的善款根據災況做分配，帶至來義鄉內的其他村落。「你們的到訪讓我們精神百倍信心十足，你們展現了原住民一家人的精神²²」。(義林村村長薛金玉採訪發言²³，2009 年 8 月 22 日。)在巴戈的報導中，即使同為受災戶，仍然可見南和部落自力救濟之餘，心繫鄉內鄰村與各部落。

然而，重建部落與家園是一條漫漫長路，巴戈經營多個平台，包含：PeoPo 公民新聞、台灣社區通部落格²⁴、個人臉書，扮演起政府有關單位與部落災民之間的「橋樑」。他表示，並非每個族人都能理解政府繁複的補助申請程序，因此除了彙整、轉發不同政府單位、各個基金會、民間團體的補助資訊外，他也了解申請內容，並以大家都熟悉的部落族人身分，去做宣傳、協助，或報導災區重建募款或物資募集資訊，讓想盡一份心力的人能夠找到適合的捐獻管道。

²⁰ 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2009 年 8 月 8 日），〈南和部落岌岌可危〉。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37049>

²¹ 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2009 年 8 月 22 日），〈南和村自救之餘再訪慰問義林村〉。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37887>；〈南和村自救之餘再訪慰問來義村〉。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37899>；〈南和村自救之餘慰問救災英雄哀家〉。取自 <http://video.peopo.org/news/37915>

²² 報導中使用族語，在此引用由巴戈所上的漢字字幕。

²³ 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2009 年 8 月 22 日），〈南和村自救之餘再訪慰問義林村〉。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37887>

²⁴ 部落格網址為 <http://sixstar.moc.gov.tw/blog/valjiluk>

在他鏡頭下，受災戶與地方政府單位不是對立的兩造，也不會強調衝突場面，該肯定政府之處就肯定，覺得對族人照顧不足之處也會替其發聲²⁵。以〈吳曉玲說 88 劫後業務量暴增²⁶〉報導為例，巴戈透過採訪同為排灣族的南和村幹事吳曉玲，讓在第一線受理村民申請業務的基層公務員分享親身觀察、並轉達政府當前的態度以及補償政策的鬆綁。

此則報導中的另一個重點是，身為部落青年的吳曉玲，面對耆老前來申請時遇到族語溝通的困難。「我現在母語都聽得懂，就是我要表達出來就很困難。」吳曉玲解釋，由於受災申請涉及許多的土地專有名詞，要使用族語對長輩說明並不容易，所幸村民多結伴前來，部落內熱心的叔伯阿姨們會替她翻譯，她也很珍惜這個學習族語的機會。對一般記者來說，這個新聞點或許沒有報導價值，但在巴戈眼中，這是他有感於族語流失，以原住民認同出發認為的重要資訊。

巴戈也透過報導，指出主要由社會多數漢族所組成的執政當局，因不了解土地對原住民族的深刻意涵，推出令人費解的災後重建計畫。風災後，部分部落的遷村計畫，涉及到各部落傳統領域的爭議，過去因國家管理之便所推行的原住民政策，導致 A 部落的現居地為 B 部落的傳統領域，不同部落間土地的重疊，更是凸顯了當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及轉型正義的困難（葉高華，2017）。在報導²⁷中，巴戈將發言的麥克風交給了好茶村村長 Labere（柯連登），讓他從部落戶長會議的討論談起，同時也表達原住民文化中，部落族人與土地應相連的心聲。

²⁵ 其他報導實例可參：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2010 年 1 月 2 日），〈屏縣府社會處說違建戶災民別洩氣〉。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45342>；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2009 年 12 月 31 日），〈八八水災災戶年終領取補助款〉。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45235>

²⁶ 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2009 年 8 月 19 日），〈吳曉玲說 88 劫後業務量暴增〉。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37712>

²⁷ 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2009 年 9 月 13 日），〈柯連登：好茶遷村鎖定瑪家阿里嵐農場〉。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39039>

此外，巴戈更要做政府與族人之間的「中介者」。他將原住民議員在鄉民大會上，彙報行政院의 勘災結果做成報導²⁸，讓無法前來現場聽取報告的族人，得以獲得相關資訊，並點出原住民族與漢族面對土地評估、測量方法論上之不同，提醒「科學測量」以及「在地經驗與常民知識」並非對立，應要能互相參照。

社群關係：採訪中的族群身分與參與式觀察

PeoPo 上超過 2400 則的報導，僅是巴戈影像紀錄中的冰山一角，與部落族人長時間的交往、相處所建立的信任感，流利的族語能力，及對於部落默會文化的熟悉，讓巴戈在進行新聞資料蒐集時，能享有外部成員無法獲得的機會，例如近距離拍攝族人邁向生命終點的歷程。

我拍生離死別，人家生重病是在安寧病房，但是我拍的不是，……，是從醫院運回來，就在家裡不打針也不吃藥，跟家裡的人一直耗到死掉。

局內人的身分，讓他能接觸更私密的主題與空間，以排灣族傳統喪禮為例，巴戈曾用 14 則公民新聞的篇幅，詳細地描述自己表哥過世後，從誦經、哭調、娛親、挖墳、墓穴土木、墓位主權、靈媒哀痛、娛親到最後分地的過程。對他來說取得採訪同意並不難，因為部落裡，一是看他長大的耆老，二是一起長大的玩伴，剩下的就是被他看著長大的青年。不過 20 多年前，剛開始拿攝影機拍攝時，如何讓族人在鏡頭下放鬆，也耗費了他不少的時間與心力。

現在部落裡面的人看到我，就給我一個綽號叫做「攝影者」啦！他們都可以透過我的鏡頭在那邊打情罵俏，也都習慣了，不像以前會躲。

²⁸ 來義鄉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2009 年 9 月 22 日），〈中央勘災結果來義鄉都不安全〉。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39539>



從事公民新聞報導多年，巴戈表示縣政府原民處或相關單位等也都知道他，若有什麼新聞亦會通知他前去採訪，很多時候報導甚至會自己找上門。巴戈也曾任記錄片導演，拍攝高雄茂林魯凱族舊萬山部落的尋根之旅，並於原民台《尋找祖靈地》系列節目中放映。雖是不同族，但巴戈認為同為原住民族的身分，讓自己更能融入其中，因此除了自身部落文化記錄外，他也樂於接受別人的邀請，前往別的部落進行拍攝；針對原住民族公共議題的報導，更不會因不同部落或族而有差異。

族人從閃躲到能在鏡頭前打情罵俏，在重要活動時還會打趣地說：「那個攝影者還沒來，等他一下。」巴戈認為當公民記者的關鍵就是要融入在地的生活。要讓社群成員知道，「我在做什麼、我為什麼要這樣做？」並接收他們的回饋。曾經有一陣子，巴戈固定在周六同一時間，於自家院子用投影機播放一部他拍的影片，讓族人可以相互討論、交流，最後再預告下周放映的主題。報導行動獲得族人肯定，是巴戈最重要的動力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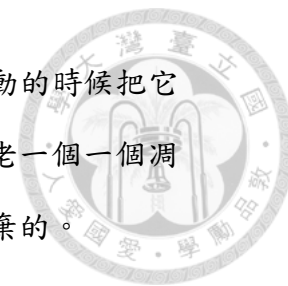
他這個人很熱忱，也帶來我們原住民很多的幫助，因為他的攝影機、他的分享，有他傳播出去讓非原住民的那個朋友，透過他報導的新聞來給我們分憂，還有分勞。(dino.utopia (大暴龍)²⁹，來義居民 Eljeng 訪談，2011 年 10 月 27 日)

雙重身分：情感責任與文化敏感性

不過，巴戈的族群身分為報導工作帶來優勢的同時，也得承擔外來記者無需面對的情感責任，需要更細膩地處理自身族群的文化敏感性。談起拍攝禁忌，巴戈以部落祭典、儀式來說明，全程拍攝不是問題，重點是這些文化活動在非祭儀期間絕不能拿出來當表演用。

²⁹ dino.utopia (大暴龍)，(2011 年 10 月 27 日)，〈公民記者列傳－巴戈〉。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86083>

有一些禁忌，平時不能辦的活動，只有靠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把它紀錄起來，再做課程教學才有辦法傳承下去，不然的話耆老一個一個凋零，那所謂的部落文化也會跟著失傳，所以紀錄是不能放棄的。



因拍攝文化活動有嚴格限制，巴戈就曾面臨到自己想報導的內容與部落傳統衝突的時刻。排灣族的 maljeveq 是每五年舉辦一次的重要祖靈祭，而祭歌 yi ya qu 也被祖先規定不得在平日傳唱，即便是以文化傳承為由，要開設課程也被禁止。但他認為為了傳承文化，自己不能再沉默，因為部落耆老一個個凋零，年輕的祭司已無法完全勝任吟唱祭歌的職責，除了製作報導完整拍攝祭歌的演唱，他也鼓勵部落兒童冒著不敬的風險，投入祭歌練唱。有感於原住民族口傳傳統的不足，巴戈選擇用影像記錄排灣文化，因為過去那種代代相傳，「難免會失真，知道的人也會越來越少」。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巴戈自許為部落文化傳承工作者，對於瀕臨失傳的部落祭儀，他必須在「公民記者」做記錄報導，以及「排灣族人」觸犯禁忌，此兩個身分中進行選擇，面對身為本土人類學家的雙重處境。

記者角色認知：做不同文化間的中介者

對於自己做的新聞，巴戈心中有預設的讀者，有時是部落族人，有時是外人，具體展現在他是否針對族語訪談片段進行翻譯。在他的報導中，可以看到族語／漢語在字幕、發音上不同的使用組合，有單純的族語新聞，也有族語發音搭配漢字字幕，亦有報導採原漢混音。巴戈說這是他刻意的安排，因為有些報導就是為了族人而做的，當然也不需要漢語出現。這也顯示局內人公民記者，在新聞選題上，不一定那麼在意爭取「大眾」讀者，而是更關心社群成員集體關心的事件。不過，即使巴戈想做更多的族語新聞，仍會受制於受訪者的族語能力，例如有些部落青年根本聽不懂族語，但相對地，族語才是部落耆老最能表達自己的「母語」。身為族語教師的他，就能發揮優勢做全族語的紀錄，再翻譯成漢語字



幕，讓年輕一輩也能更認識自己的文化。

透過「字幕」語言使用的報導策略，巴戈同時要扮演族人與外文化之間的「中介者」。不同於主流媒體中再現「他者」，巴戈以局內視角帶領著觀眾認識媒體上常見的祭典、傳統習俗語生活習慣，正是要打破既定的刻板印象與走馬看花或獵奇的視角。他使用淺白的語言，讓外人有興趣聽，也聽得懂；在對外人說明、轉譯、詮釋文化意涵時，他則背負著自身族群認同與原住民族集體的期待。

我也拍一些我們（排灣族）文化的東西放在 PeoPo 讓外面的人知道，因為如果只有我們自己知道的話，外面對我們的成見、對我們的那些誤解就會一直被記著。

總的來說，他雖然不會直接在畫面裡出現，但以側標、跑馬燈及字幕翻譯等策略，決定在報導中現身的程度，凸顯了局內人公民記者主體位置的多重性。

新聞意理：有自身立場但不扭曲事實

面對主流媒體長期重都會、輕地方的資源分配，以及對原住民報導的獵奇視角與他者化，巴戈更希望呈現部落內溫馨的一面，即便是平凡不過的日常，他要通過報導，對社群發揮正面的影響力。

我是比較傾向於把我們部落，比較溫馨的（人、事、物）報導出來，（報導）會對我們部落人會有正面能量的，我才會去做。像一些打殺殺、一些五花八門的，我絕對不會去沾，……，哪怕（新聞事件）是小小的。

原住民族身為台灣四大族群中的最少數，更不用提整個原住民族內部的異質性，能分配到的新聞版面本來就少。巴戈認為，公民記者、公民新聞就是一項優勢，他不需要對「商業」媒體負責，沒有趕稿壓力、不用照上級指示的新聞價值

而跑新聞，長期關心能讓報導的穿透力更強，對比過去服務於主流媒體，一則新聞最多就給九十秒的篇幅，公民新聞能提供更詳實的內容，有文字、圖片、影音，收看也不受制於播出的時間。



巴戈認為一則好的報導，應該想像自己是一個平台，一個發聲管道。「能夠不說就不說，只要把事實正確的報導出來就好了」，對他而言，如果在報導中加上自己的看法，就會變成是一則評論，而不是新聞，這是巴戈對記者身分的理解。與身俱來的族群身分，及做為社會少數、弱勢的一方，加深巴戈的族群認同與關懷，在他的報導中，很少會出現單數第一人稱的「我」；但站在原住民族的立場替自身社群發聲時，則會出現「我們」的集體稱呼，顯現了他身為公民記者在報導中的位置，並非完全客觀中立，而是帶有族群及身分認同的主體認同。即便是最平凡的日常，巴戈到哪都帶著器材，因為眼睛所見稍縱即逝，影像紀錄卻能捕捉片刻的永恆，他說替原住民族發聲、傳承部落文化沒有退休的那一天。

貳、 公民記者阿 Ben—陳本康

陳本康，1964 年出生於屏東憲光十村，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博士。具有應用地質、水土保持雙技師執照，現任康技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於台灣省應用地質技師公會理事長任期內，為推動《地質法》投身公民新聞產製。透過自學、參與工作坊及採訪實務，陳本康形塑了對公民新聞及公民記者角色功能的認知。他認為新聞應有更多元的可能，每一種報導都有相應的觀眾群，中立、客觀、平衡報導的概念他都知道，但卻不會將其視為新聞產製的指南，而是在「真實」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報導，與社群成員在議題中互相回饋。他認為公民記者既是報導者傳遞資訊，但最重要的是讓自己成為公民新聞的「受惠者」。



社群認同：技師生涯與職業公會

具有水土保持與應用地質雙技師資格的陳本康說，在考上成大礦業及石油工程系（現已改名為資源工程學系）前，對這兩個領域一無所知，與當時大部分的學生一樣，分數到哪，就去念哪。他幸運地念出了興趣，畢業後前往美國阿拉斯加州立大學念工程地質碩士，回台後在工研院服務了 4 年多，因為不喜歡那裡工作環境，故在 1994 年，30 歲的他決定自立門戶，創辦康技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己當老闆，一邊執業一邊取得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博士的學位。

提起技師生活，他說一份工作本來就該盡力做到「最好」。對職業身分的認同感，除了求學、職涯歷程外，陳本康認為該從《技師法》說起。

像我們是技師，就依照技師法就成立技師公會。那政府有規定每三個月要開一次會來運作。那這個公會呢？我們的公會是公家的「公」、公共的「公」。當比如說九二一地震的時候，很多人災區不願意進去看，但是政府他可以跟我們技師公會說，叫我們去就要去這樣子。

《技師法》規範了技師的職責範圍以及要加入公會的義務，其中第 14 條更提到：「技師受政府機關指定辦理公共安全、預防災害或搶救災害有關之技術事項，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為維護公共安全與公共利益，因應而生的專業技師制度、技師公會的例行性聚會，都讓陳本康對自身職業認同感與日俱增。

公民新聞的起點：推動《地質法》

2010 年 4 月 25 日，台灣發生國道史上最嚴重的走山意外³⁰，用 4 個人的生命重新喚起國人對延宕 13 年的《地質法》的重視。當時身為台灣省地質技師公會理事長的陳本康，受邀至公共電視的《有話好說》，代表專家去參與相關討論。

「當時我在裡面走（公視）就有一個印象說，有『PeoPo 公民新聞』這個東西。」

³⁰ 2010 年 4 月 25 日，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 3 號）發生山崩事件，造成 4 個人罹難，朝野雙方都呼籲盡速通過自 1997 年就起草的《地質法》，以免憾事再度發生。



推動《地質法》期間，陳本康多次聯絡記者來採訪公聽會，但媒體總以各種理由婉拒，讓他開始反思媒體的功能與不足。陳本康解釋，《地質法》基本精神就是，由政府進行地質調查再將資訊公開，讓人民可以知道自己住得安不安全，這應該是公民「知」的權利，既然媒體不報，那為什麼我不乾脆自己來，正巧碰上會剪片的朋友，陳本康就向他拜師學藝。

有一天我看到陳文茜的《正負 2 度 C》，我就想是不是可以自己來拍，後來剛好有一位朋友結婚，用威力導演四剪了婚禮影片，我就請他簡單地教我，從完全沒有基礎開始研究，學工科的就喜歡這樣，一個禮拜後，我就自己做了《地質法》的報導。

為了推動《地質法》立法，陳本康做了 3 分鐘的短片說明其重要性，自行寄送 email 給多名立委，短短半小時內就得到立委辦公室回應，並在臉書上引發迴響，這才讓陳本康發覺「原來公民記者這麼有用」，可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培力歷程：關鍵轉折與典範人物

為了推動《地質法》而當公民記者的陳本康，可能一個月或一季才有一則公民新聞的產出。2010 年 12 月 8 日，前後推動十餘年的《地質法》正式由總統公布全文，陳本康加入公民記者的初始目標已經達成，他報導的頻率變得更低。直到，2011 年 4 月，參加 PeoPo 的高雄影音工作坊，與其他公民記者有更多接觸，及受到工作坊導師李惠仁導演的影響，才讓他重新思考公民新聞的力量。

經過工作坊的課程，自己創業當老闆的陳本康，在理解到商業電視台的營運模式後，對於當前的媒體亂象並不意外，卻也更加敬佩如李惠仁這樣的獨立記者。2011 年 5 月，陳本康在公民記者相互交流所使用的 google 論壇中，看到了公民記者大暴龍分享的採訪訊息，得知時任馬英九總統將前往新竹生醫園區預定地進行剪綵。陳本康心想，住在台北的大暴龍都願意到場關心，我公司與預定地

只有五分鐘的路程，為什麼我不親自到現場去看看？「我去的時候就很好奇啊，贊成和反對的人數大約是 10:1，那他們到底在抗議什麼？」更吸引他目光的是，現場有一群阿公、阿嬤頂著烈日參與抗爭，採訪過程中陳本康才知道，從前那些覺得「那離我太遠了！」的土地徵收是什麼，決定推出一系列的報導，從民意調查的可信度、過往相似開發案分析、廠商進駐意願、建設設施到客家農業等面向切入來分析。

陳本康說若不是當公民記者，他根本不關心社會，因為「以前我賺錢都來不及了，覺得關我什麼事。」但在 PeoPo 與其他公民記者邀請、帶領下，他開始大量接觸過去「與他無關」的人、事、物，才翻轉他過去認為「記者就是文化流氓」的印象，當公民記者讓自己也成為過去他口中：關心社會的「傻子」。

報導實作與記者角色認知：結合專業與理念，成為公民新聞的受惠者

2012 年，陳本康結合自己的地質專業，提案參與「weReport 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的計畫，成功獲得補助，其成果作品「樂生不樂³¹」更獲得當年度公民新聞獎專題組的肯定。

當政府官員，照章辦事，缺乏同理心；當工程師，依規範設計，缺乏文化素養，樂生療養院八十年的文化保存，只能換得學生、老人及文化人，無數次的抗爭與無奈（2012 年 8 月 29 日，陳本康旁白，引自〈樂生不樂〉）

你說樂生今天要保護，要做一定做得出來，看你要怎麼做。重點又回到剛才講的，如果今天主事者把樂生保留當一回事，……，絕對不至於到今天這樣的成果。……。像我們學工程的看這些事情，也深自反省，……為什麼我們以前做，一定要這樣，就是說人家交給我怎麼樣、就

³¹ 阿 Ben（2012 年 8 月 29 日），〈樂生不樂〉。取自 <https://youtu.be/rugIctYY57s>

一定要怎麼樣去做，從不考慮別人，其實不是這樣，工程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被考量。(技師蕭仲光，2012 年 8 月 29 日，引自〈樂生不樂〉)

陳本康以地質專家的視角出發，訪問朋友、同事及工程師，以捷運工程導致「地層滑動」造成的公共安全隱憂作為切入點，同時呈現樂生療養院的院民、工作者、學生團體的心聲，點出樂生在歷史與文化意義上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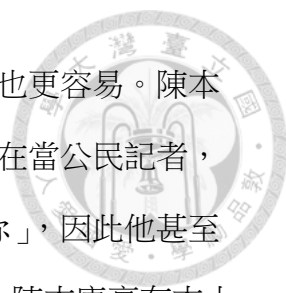
陳本康說，做公民記者不能為當而當，必須思考當公民記者的理由、反問做公民記者能替自己的生命帶來什麼？以他自己為例，雖然一開始加入公民記者的行列是為了推動《地質法》，公民報導只是一種工具；但在過程裡，陳本康認識了新的朋友、受到了感動，讓他真正成為公民新聞的「受惠者」，而有動力堅持至今。舉例而言，《地質法》通過後，地質圈開始推動我國加入聯合國地質公園的運動，當時 PeoPo 平台的王建雄，就引薦陳本康至公視《我們的島》分享，讓這個議題可以獲得更多關注。

加入了這個平台，對我的工作、我的理想都有幫助，他們也能推動這個公共議題，這樣才能長遠，雙贏！雖然這些都不是當初我加入平台的目的，只是到最後發現認識了新朋友和新視野。(2013 年 11 月 25 日；引自潘萱文，2014，頁 94)

社群關係：採訪中的技師身分與參與式觀察

陳本康敘述，早在當公民記者前因為工作需要，他就有習慣在地質調查的時候拍照、建檔，以利後續的工程或是追蹤；只不過當公民記者後，他多會了一種多媒體的表達方式，讓這些專業性高、枯燥無味的資訊，能用更吸引人的方式呈現、多一個管道讓更多人知道。

有技師身分的陳本康來做報導，相較於外人自然有其獨特之處，他說一來是自己有專業知識，「提到一些專有名詞，就跟一般記者人、事、時、地、物講過



去不一樣」，二是同業、同行會更願意提供內部資料，溝通起來也更容易。陳本康表示他與受訪對象「都是好朋友，都很熟。」，大家也知道他在當公民記者，報導也都是比較正面的，「不會是拍不好的東西，（想要）修理你」，因此他甚至不用打招呼拿的器材就拍了，大家沒有任何的戒心。由此可見，陳本康享有本土人類學家的優勢，能夠使用行話、術語直接與社群成員對話，也因為熟悉更容易獲得信任與機密的資料。

此外，在地質、水土保持議題中，陳本康也提到自身職業讓他有更高的採訪方便性，以山林地的水土保持調查而言，一般記者還是要先約定採訪時間，才能被允許進到現場，但「我就是工作的人，我只是隨手拿錄影機器來錄影而已。」

陳本康舉例，台灣風災頻傳，技師身分讓他能第一時間進到封閉現場勘災、測量，在會勘現場，他既是公民記者、也是技師，一來能補主流媒體人力之不足；二是他有能力做專業判斷，不至於因採訪而干擾災害評估；再者，由他來採訪，能消除技師們害怕發言被斷章取義或誤讀的疑慮。

在專業議題的報導上，陳本康也直接在鏡頭前出現，用第一人稱念旁白串起整篇報導，但在採訪朋友（技師同行）時，他則反過來變成以第三人稱視角進行訪問。亦可看見，他做為本土人類學家在新聞產製過程中，主體位置的變化。

新聞意理：「為自己而報」的小眾報導價值

談起如何做新聞，陳本康說自己不是新聞本科系，不會從新聞原理、調查報導開始。過去在工作坊中，他也曾學到新聞媒體作為「第四權」，應該負責揭弊、對抗霸權，不過他認為那個就交給專業記者去做就好。他觀察媒體現況，發現組織都有特定的意識形態，那自己經營的 PeoPo 頻道當然也可以有主觀意見。

中立、客觀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因為現在台灣媒體你也知道，每一家媒體都有他特定的立場，比如說有一個媒體親藍、一個親綠，對



不對？媒體他都可以有角色，那我們每一個公民記者就相當於一個電視台的頭，只是我們很小、他們很大而已。電視台都可以有他自己的主觀意見，那我們一個人，當然我更可以有主觀意見啊！

陳本康表示，他能理解媒體老闆為了商業利益，犧牲新聞品質，但這並不是他想要的，因此才選擇加入 PeoPo。「我自己報導我自己決定就好，好壞我自己負責。」他自己報導自身關心的事情，希望提供社會正面的力量。

到底什麼才稱得上是有價值的新聞，陳本康展現開放態度，他將新聞產品比喻成一道道菜餚，有人喜歡嚴肅、有人喜歡腥羶色，因此他不會設定條件定義新聞，因為觀眾喜歡的都不一樣，商業台有人愛、大愛台和公視也各有支持的觀眾群。「為什麼要設定一個媒體每天都報那種（特定標準）的才叫新聞？這就是我們（公民記者與專業記者）不一樣的地方。」

陳本康進一步說明，他認為公民記者與記者背景「不同」，就是一種市場區隔，沒有什麼好與壞。記者在報導水土保持議題，只需要具備很簡單的嘗試，例如雨量大，比較容易引起土石滑動即可，「反而是由新聞專業的角度，來探討這個新聞的傳播性或是目的性，角度會不一樣。」而較專業的部分就讓他來做。

陳本康表示他知道科班眼中 100 分的新聞，應該是什麼樣子，不過他覺得做到 61 分也可以，一來是公民記者時間有限，二來是他最在意的是被記錄下來的「內容」，而非有多少訂閱。報導技師專業相關議題，有這種資訊需求的人有限，雖然陳本康沒有預設讀者群，但依他的觀察，收視群大概都是自己工作上的朋友。「就變成是一種小眾報導，……，我只是很忠實的把我們的辛苦或是過程記錄起來這樣子。」身為社群深度參與者，陳本康說報導就是為了自己而報，看得人少沒關係，看得人多他更高興。



報導實作：化複雜為簡單，重視社群的回饋

上班的日子裡，陳本康就用手機、輕薄的相機進行拍攝，將影片製作能力帶入職場，將自己參與的演講、研討會，或代表公會與政府有關單位對話的見聞轉換成報導，這些都是外人無法輕易獲得的採訪機會。他卻能透過鏡頭，帶領觀眾進到深入平時無法看見的角落，如：水庫、自然保護區、地質調查的現場。他選擇以生活化、小單元的方式³²，介紹地質、水保工法，或是把工作場合中遇到的無名英雄的故事說出來。如：執行水庫清淤的職業潛水員³³，陳本康就曾為其推出一系列的報導，潛水員也分享觀後感，來自社群內的鼓勵也讓他更有動力。

他們也會給我回饋，有一個潛水員他就拿我拍的影片給他女兒看，結果他女兒就跟他說：「爸爸，我都不知道你的工作，為了我們國家那麼危險和辛苦，謝謝你。」那我就聽到了就很感動，就覺得很有意義。

陳本康認為，做公民新聞對地質圈、水保圈也很有幫助，透過報導同業的人凝聚力就會更強，他常收到圈內人的正面鼓勵，也有人會主動提供影片、照片請他製作成報導；另外，資訊經由公民新聞的傳播管道，變得更快、更廣。過去，當他要倡議一個新的概念，就要發一篇研討會 paper，真正會讀的人也是少之又少，但短短 2 分鐘的影片，即使是外行人看完，也可以對議題有大致的掌握。

雙重身分：有意識報導立場選擇

在報導與自身職業相關的報導時，陳本康形容，同個新聞事件，一定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有人會採批判性的視角、凸顯問題或是負面表現，但他自己是「有意識地」選擇持正面的報導立場。

³² 阿 Ben (2015 年 1 月 27 日)，〈地工砂腸袋〉。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265327>

³³ 阿 Ben (2014 年 7 月 2 日)，〈職業潛水員〉。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247347>；阿 Ben (2014 年 9 月 18 日)，〈職業潛水證照〉。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253195>；阿 Ben (2015 年 1 月 19 日)，〈石門水庫 DIVING TEAM〉。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264039>



有些人就會針對這種馬路沒鋪好，政府要趕快來修，水土保持沒做好要趕快去做。那我一般來講，我是比較報正面的，因為我本身就是在執行的人，我們已經很辛苦需要人鼓勵，所以我就報哪裡做很好、哪裡做很好，這樣子。……，負面的媒體就已經報不完了，那我們也知道報負面的會有收視率，但是那不是我們的目的。

陳本康說每個新聞事件都有不同的報導切入點，以水保工程為例，不論做得再好，總還有進步空間，但他身為局內人更希望能替自己、為同業發聲，因此選擇有利於技師族群的報導立場。陳本康舉例，在工作中，他看見政府努力做對「人民有益」的決策，但這種報導不會增加點閱率，所以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其實很多政策需要被宣導，才能讓人民過得更安全。」因此，他認為只要不要造假，這類的訊息也可以是公民新聞的題材。

陳本康表示：「當然我們公民新聞、公民報導，不能只是美美的，你要有公眾性、公益性」，他認為雖然自己的報導沒有公民、政治性的意識，但至少要有「知識性的意識。」例如他報導去參觀野柳地質公園，看起來好像是旅遊，但他就會告訴大家，來這邊要看哪三個景觀、它們是怎麼形成的。

陳本康說，加入公民新聞之初，有位教授分享一個例子，有個公民記者在災難現場拿起了器材開始拍，即使畫面晃動得厲害、沒有任何口白，依舊獲頒新聞獎肯定。他認為依照此邏輯，公民新聞沒有既定的模式，公民記者當下記錄的這個「動作」、這個「念頭」，才是公民新聞的價值所在，而非最終的成品品質。



參、 公民記者彰化縣環保聯盟－吳慧君

吳慧君，1992 年出生於彰化縣鹿港鎮，是環保運動中的年輕面孔，目前擔任非營利團體「社團法人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執行秘書一職，與該團體總幹事施月英以「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為名，共同經營 PeoPo 公民新聞頻道，利用公民記者的身分，成功打破與會人士不得在環評公聽會中錄音、錄影的限制。做為深度參與者，在報導中，她更直接使用第一人稱，以環團員工的身分現身，揭露自己的主觀立場，帶領觀眾進到污染的現場，將複雜的專業內容轉譯為常民語言，點出環境破壞現狀與未來危害，以爭取更多的社會關注。更重要的是，她將公民新聞結合工作日常的拜訪，幫助遇到環境汙染、在開發案中受害的居民培養自主論述的能力，自己得到培力之餘，也賦權他人。

社群認同：環保運動中的一個年輕面孔

今年 27 歲的吳慧君，參與環保運動的資歷在圈內算淺，過去她曾經抗拒「年輕」標籤，擔心別人會認為她能力不足，直到漸漸接受這是一項優勢，代表她未來將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很久，更有發聲的本錢。八年級生的她，對環境議題的關心有跡可循，高中時，她就曾參與反台中火力發電廠、反核遊行等活動。2013 年，就讀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4 年級的吳慧君，接下了環保色彩鮮明的台灣綠黨外文翻譯的工作，她開始正式接觸環保領域的相關知識、認識環保團體、參與社會運動，了解到每一次的行動背後，都是無數次會議、收集各方專家意見、大量閱讀學術文獻的累積，她對環保理念的認同也與日俱增。

出身彰化縣鹿港鎮的吳慧君，在臉書上關於我的部分寫著這麼一段話：「儘管人生而平等，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同樣承受著環境退化的負擔（Dowie, 1995）。」彰化深受空汙影響，讓她更是有感環境破壞對人類生活空間的危害。

那時候發現社會上有這群很無私的人，默默在為大家付出。我是彰

化人，就想說：「好，那就回來服務看看。」

2014 年 6 月 17 日，畢業沒幾天的吳慧君正式到職，成為彰化縣環保聯盟唯一的正職。跟著被獨立記者朱淑娟稱為「海岸女孩」的總幹事施月英一起，征戰無數個開發案的公聽會、大大小小環保遊行等。外文系畢業的她，花了近一年的時間熟悉 NPO 的運作與建立對環境議題的知識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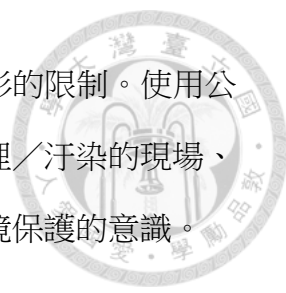
公民新聞的起點：作為一種倡議渠道

PeoPo 在開台之初，就積極鎖定非營利組織為重點的推廣對象（王晴玲，2007）。彰化環境保護聯盟自 2009 年加入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已來，已經多次透過公民新聞的報導，成功獲得社會迴響與主流媒體的跟進調查。

2009 年中科四期、國光石化環評案，一場場公聽會、環評會上主流媒體的缺席，讓原本作為開發案「監督者」、場場出席與會的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開始思考：既然公聽會上發生的一切，主流媒體不願意報導，許多環境保護運動無法獲得關注與能量，那是不是可以自己來嘗試？

透過這樣子的（公民）媒體報導，我覺得議題真的有被發現。尤其像是國光石化，……，我們在會場上說，我們是公民新聞，我們也可以錄影，我們也是記者！因為平常你在環評會上是不能錄影的。那我們就講說我們是公民記者，我們要報導這樣子，所以就解決了問題。（彰化縣環保聯盟總幹事施月英訪談內容，2016 年 8 月 17 日，引自 PeoPo Webcast³⁴）

³⁴ PeoPo Webcast（2016 年 8 月 17 日），〈彰化環保聯盟 用報導守護環境〉。取自 <http://video.peopo.org/news/317299>



以公民記者的身分，她們成功打破公聽會上不得錄音、錄影的限制。使用公民報導來守護環境，將工作日常所拜訪的居民心聲、廢棄物處理／污染的現場、公聽會各方團體的發言用影像記錄下來，目的是激起民眾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報導實作：不避諱主觀報導

以〈農地不重稻 種植重金屬³⁵〉為例，吳慧君也不排斥在鏡頭前露面，直接帶觀眾進入新聞事件現場，同時解說發生的污染案例。

其實這個溝很久以前就污染了，,,,,, 為什麼（政府）都沒有完善處理過。.....，它們用了同一條溝，只是旁邊的稻田還沒有檢測出來，可是大家其實都知道，那溝，水是一定有問題的。.....，那既然都知道問題的源處是哪裡，政府應該是找到源頭去解決，而不是說：「啊，找不到犯罪事實。」這麼明顯的事實就在你眼前，卻不去處理，一直用一些理由搪塞，覺得對這個政府很失望。（2015 年 2 月 25 日，引自〈農地不重稻 種植重金屬〉）

吳慧君在鏡頭前的真情流露、批評政府的消極態度，顯露出她對環境破壞的憂心，且毫不掩飾自己身為環保運動者的報導立場。她表示，很多時候中央或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是共同利益關係人，環境議題在短時間內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有限，經常會被主流媒體遺忘，或是要有衝突畫面才能登上版面。既然自己是第一線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的人，自然要替環境發聲，並不會特意追求「平衡報導」。

在很多由「彰化縣環保聯盟」於 PeoPo 發表的報導中，吳慧君與施月英輪流出現在鏡頭前，有時候使用第一人稱對公聽會現場的發言進行評論，有時候則是讓其中一人以「環團代表」的身分做為消息來源，由於他們本來就是以環團的名義登錄於平台，自然也就不避諱地採取主觀的報導方式。

³⁵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2015 年 2 月 25 日），〈農地不重稻 種植重金屬〉。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268889>



雙重身分：環保運動工作者與公民記者

不過，話鋒一轉，提起環境污染與環境運動，吳慧君表示：「居民才是最重要的。」倘若居民不在意，那環保團體的抗爭就毫無意義。不論是公民記者或者是環保團體，這兩個角色都是從旁協助，不應該是抗爭的主體。

彰化縣環保聯盟投入環保運動多年，自有一套喚起在地居民對環境議題重視的方式。她們認為第一步就是告知受害者，改善資訊不對等的問題，透過舉辦說明會、發放傳單，讓居民認識開發案中經濟層面外的問題；再來是召開記者會以獲得更多的關注；第三步是讓受害者能夠被看見，協助居民成立自救會，邀請相關的專家學者針對環境議題進行培力；第四步是串聯社會上關心此議題的人及公民團體；最後，也最重要的——參與政府決策的會議——作為環保團體，她們尖銳提問、積極監督，也看著居民逐步建立自主論述（何思瑩，2015）。

吳慧君說，她的角色「比較像是在後面推他們（當地居民）一把」，透過公民新聞報導讓議題被認識，也會讓居民更有信心。在她製作的大城產業園區開發案報導³⁶中，就能看見大城鄉民積極爭取發言機會，要表達自己對地方產業未來的看法，與她初次拜會村民時，那安靜的景象相距甚遠。

「大城鄉很慶幸它很落後，代表它沒有工廠的進駐，它是一個很乾淨的土地，由我們這些麥農，開始來做一個守護淨土的工作。」

「我不要工業，我要農業。因為縣長有說北工業南農業，我希望就是把農業提升起來，大家如果有錢可以賺，子孫也會回來。把我們的產品精緻化，多種一些五穀雜糧把它推銷出去。」

「大城產業園區，我們是堅決的反對，我們不要再走工業的那條

³⁶ 可參考彰化縣環保聯盟報導，2015年5月29日，〈魏明谷宣布撤銷大城產業園區 民眾歡呼鼓掌支持〉，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277819>

路，再讓它（工廠）來跟我們搶水。」

在耕耘環境議題時，吳慧君清楚地知道運動者與公民記者的角色差異。作為運動者，主要的目標就是「培力」居民，讓他們能夠展現主體意志，並自主延續運動能量；而公民新聞則是另一個發聲管道，除了喚醒內部居民的意識，同時也能吸引更廣泛的社會關注。這樣的雙重處境也展現在她的報導中：如果是揭發污染或開記者會的場合，她會直接以環境運動者的姿態現身，衝鋒陷陣、反對開發；但在有當地居民的場合，她更關注自己「輔助者」的角色，為了不逾越居民的主體意識，她選擇讓「公民記者」的角色多於運動者。

這樣的雙重身分切割不易，一來，她們與居民或是自救會成員都有一定的接觸，但在抗爭現場時，她依然得斟酌身為運動者的論述會不會過於激進，逾越居民的本意；二是當記者在做報導，不能只有傳達居民的訴求，她們更擔負起更知識性、資訊查核的工作，要花更多時間閱讀文獻、請教專家學者，確保論述的正當性和可行性。

新聞意理與記者角色認知：傳遞真實、透過「解釋」影響議題設定

參與環運，其中一個主戰場就是環評公聽會，吳慧君發現所謂的專家學者，有很多不負責任的發言，怎麼能不被大眾知道、受到監督？吳慧君回憶，2016年11月她參加成大「雲林離島工業區開發歷程、環境影響及未來展望」開發計畫25週年成果發表研討會，原本只是例行性的開機拍攝，卻意外記錄下了成大前校長黃煌輝關於麥寮綠牡蠣的荒謬發言：「只要讓牠吐、吐幾天這樣就好了，因為吃一點、吃一點點那個銅綠對身體也沒有壞處。」³⁷吳慧君表示，公民新聞的力量就在此，主流媒體沒有餘裕參加會議，但不代表這些資訊不該被大眾檢視，她的報導就是「要讓大家看到最真實的樣貌」。

³⁷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2016年11月19日），〈成大前校長：毒綠牡蠣吐沙可食 現場竊笑 民眾訝異〉。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291977>



另一則令吳慧君印象深刻的報導，是〈環保署通報真的有用嗎！—六輕黑煙通報全紀錄³⁸〉。報導中完整呈現，彰化縣環保聯盟打電話檢舉六輕疑似排放黑煙的過程，全程僅使用字幕及放上當日的通話錄音，卻立刻在網路上造成迴響，她認為這正是大眾對政府消極作為的不滿。

吳慧君認為，主流媒體為營利追求點閱或接受財團業配，自然有些議題不會來關心、不敢來報導，同時「主流媒體的字數、片長都很有限，它也無法只選擇一方的內容（需要平衡報導），所以東西就都無法很完整。」那身為 NPO 的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不受到其他勢力的箝制，又是倡議環保理念的第一線，對這些議題的報導更是責無旁貸。

「居民的訴求、當地的情況，就可以由公民記者來報導」吳慧君以貼近在地居民、反對不當開發的視角進行報導，就是要強化弱勢的聲音，實現強客觀性。透過鏡頭，她將環境議題背後複雜、難以消化的知識，轉化成常民語言，喚起民眾的環境意識、甚至動員受害居民，促使其做出集體行動。

政府一直有在做開放資訊，但是對於一般民眾而言還是很難理解，全部都是生硬的 raw data（原始資料），還需要環保團體進行數據分析、解讀，還需要公民記者散播最終分析的結果。

對吳慧君來說，在監督政府與財團或是影響媒體議題設定上，環保團體的運動者身分和公民記者相輔相成，環團分析、解讀政府公開的原始數據，公民記者再用淺白的話將分析結果傳遞出去，看到民眾開始關心周遭環境議題，與成功為台灣多守下一塊淨土，就是最令她開心的事。

³⁸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2016 年 7 月 5 日），〈環保署通報真的有用嗎！—六輕黑煙通報全紀錄〉。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313503>

第二節 參與型「觀察者」



「參與型觀察者」公民記者，在採訪現場與報導時所站的立場，他們做為「觀察者」的角色大於「參與」本身。相較於傳統記者以「陌生人」的姿態出現在採訪現場；這類的公民記者，由於長時間關心特定議題、多次的採訪追蹤，對社群內部成員來說，雖不如朋友般親密，但仍然被理解為是善意的熟面孔。受訪者將其視為可信賴的發聲管道，但不會對其報導成品、立場有特定期待；相對地，對「參與型觀察者」來說，不論採取有利、中立或批判社群的報導視角，都不會像「觀察型參與者」來得有包袱。

壹、 公民記者傑利－陳治安

愛好生態、生物的陳治安是客家人，出生於苗栗縣銅鑼鄉，現職為社區大學、國小社團及數位機會中心講師，教授公民新聞採訪與智慧型手機使用。從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畢業後，他短暫服務於 TVBS，於此受到新聞培力，但藍綠意識形態惡鬥與選舉新聞，讓他選擇辭職進入生態傳播公司，因而有機會一窺罕為人知的自然秘境；他曾至印度拍攝客家華人移民紀錄片、參加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到蘇門答臘雨林保護志工，對客家社群與生態議題的關懷，充實了他的公民新聞報導。經歷教育歷程與主流媒體的訓練，讓陳治安在爭議事件中，更在意與受訪對象保持距離；不過當報導是替弱勢發聲、為無法言說的動植物發聲時，「同理心」——成為陳治安公民新聞產製的最高指南。他認為只要是真誠的報導，就是好新聞，新聞的公共性能從生活中發掘，報導題材就在你我身邊。

社群關懷：對環境保護、生態的熱愛

「再也沒有什麼比保護環境更重要的了。Reduce! Reuse! Recycle!」，陳治安在臉書上分享自己的理念。因為家裡務農，從小他就耳濡目染，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觀察大自然裡的生命。陳治安表示，環境保護很重要，因為好的環境才能養育

好的生態系，生態圈穩定了，生活在其中的動植物，包含人類，才能活得更好。求學工作後，每隔一段時間返鄉，他都有很深的體會，一來是鄉下與都市生活型態的差異，二是童年記憶中在清澈的溪水中的魚蝦，漸漸消失。



培力歷程：媒體生態與新聞理念

大學就讀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的陳治安，求學期間累積許多多媒體創作的技巧，雖然和新聞或攝影工作擦得到邊，但關於新聞專業知識，包含新聞攝影、採訪的技巧等，主要是 2003 年畢業後進入 TVBS 中部地方中心擔任攝影記者期間習得的。當時，他正巧碰上陳前總統 319 槍擊案案發前後，在 SNG 組的他每天就是跑選舉場合，看了太多只論顏色，不論是非的報導，他也討厭只能傳遞負能量給社會的自己。

你也知道藍的罵綠的，綠的罵藍的，就是這樣子而已。那我們（記者）就是透過藍綠的衝突、口角去傳遞這樣的新聞……，所以我那時候心裡面很大的感受是：「我每天都傳遞不好的訊息、都傳遞負面能量給社會大眾。」

「小記者跑的新聞其實都是長官指定的。」陳治安表示，在主流媒體服務最深刻的體會就是：主管們都是在挑選所謂「有收視率」的新聞來餵觀眾，腥羶色的新聞能刺激收視吸引廣告主，當前的媒體亂象也就不令人意外。319 槍擊案落幕不久，陳治安就離開 TVBS 進入生態傳播公司。

對熱愛生態、環境議題的陳治安來說，2004 年到 2007 年從事生態攝影，開啟了他全新的視野，因工作的需要，使他得以進入人跡罕至之處，拍攝生態、物種與環境；那裡的步調和新聞台要求快、狠、準的操作很不一樣，有更多時間能發揮在新聞台內學到的技術。



記者角色認知：確立自己要替無聲者發聲

2007 年 5 月，因人生規劃，陳治安離開原本的工作崗位，開始單車環島並積極參與環境、生態研討會、講座。2008 年年初，他以記錄專長，受邀參與印度加爾各答客家華人移民的紀錄片拍攝。同年 4 月，他申請向客家委員會（後簡稱客委會）的築夢計畫通過，到印尼蘇門答臘擔任雨林保護志工 3 個月。親臨現場，目睹人類為了土地開發，大規模砍伐，用熊熊烈火吞噬雨林，這更堅定了陳治安要替這些「無法發聲」的生命發聲的信念。

結束志工服務後，他到弘光科技大學擔任網路電視台約聘人員，但對客家文化及生態議題的關心並未消滅，他參加多場分享會談當雨林志工的體悟；利用假日到台中南屯百年客家庄，義務為聚落貢獻紀錄專長，和居民成為朋友；會說客語又會拍片的他，在築夢計畫後與客委會建立良好的關係，經常支援各式專案。

公民新聞的起點：苗栗大埔鑿田事件

2007 年 4 月底 PeoPo 創台，原本就是公視忠實觀眾的陳治安，第一時間就知道此消息，並於同年的 11 月註冊帳號，但當時的他並不會主動上傳報導。改變的關鍵發生在 2010 年 6 月——他看到公民記者大暴龍對苗栗大埔鑿田事件的相關報導³⁹。畫面中的一切都令他震撼，警察圍著農民，讓怪手開進去東鑿一塊、西鑿一塊，主流媒體沒有報導，反而由公民記者來揭露。陳治安心想：住在板橋的大暴龍都願意花時間到苗栗來報導，那身為苗栗農家子弟的我能做些什麼？

這個（大埔）事件開始，我請朋友帶我進去大埔，……，開始認識那邊的農民。大暴龍的報導其實點閱率很高、影響力也有，主流媒體也開始報導，但我也很想替農民發聲。……從小在鄉下長大，自己家裡也有田。如果有一天事情發生在我爸爸身上或我身上，我該怎麼辦？

³⁹ dino.utopia (2010 年 6 月 9 日)，〈台灣有個「苗栗王國」？〉。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53408>；(2010 年 6 月 13 日)，〈當怪手開進稻田中．．．〉。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53635>



大埔事件爆發後兩周，陳治安聯繫從事英文翻譯的好友幫忙配音，加上中文字幕，以「When the Excavators Came to the Rice Fields」為題，將報導上傳至 CNN iReport，希望讓懂中文或英文的人都能知道台灣苗栗發生了什麼事。大埔鑿田事件，讓陳治安認識了許多公民記者朋友，更建立網路論壇供大家互通新聞資訊、分享採訪經驗，成為他正式投身公民記者的起點。

陳治安說，自己從小就愛好大自然，時常關注生態議題，又碰巧遇到與環境息息相關的土地議題（即大埔案），才會走上公民記者一途。由此可見，參與型「觀察者」公民記者們，雖沒有觀察型「參與者」那種捨我其誰的使命感，但也因為長期關心特定議題，在特定「機緣」下成為公民新聞的貢獻者。

受過媒體組織的新聞訓練、也體驗過公民新聞採訪實務的陳治安，談起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他更傾向新聞記者「觀察者」的角色，尤其是在處理所謂的嚴肅議題、爭議事件時。即便同為苗栗客家子弟，但是採訪大埔案時，他並不會下場參與抗爭，而是用鏡頭將農民的無奈記錄下來。大埔案爆發後，他陸續又去拜訪了好幾趟，與農民變成了朋友、更很幸運地獲得了他們的信任。

其實我那時候有點壓力，覺得自己畢竟無法時時刻刻待在這裡，大埔的秋琴姊說比較相信我們（公民記者）的時候，我心裡的感受是很複雜的。

這個複雜的感受，也讓陳治安往後在處理與自身社群相關的報導時，更多了幾分思考。大埔案時，在熱血抗爭現場，他做了數則報導傳遞單純農民的立場與心聲，時隔 7 年，再次面對家鄉反設立銅鑼熔融廠⁴⁰時，即使有個人立場，但他仍在報導中，納入縣政府環保局代表及設廠公司董事的發言。

⁴⁰ 傑利（2017 年 7 月 14 日），〈反對設立熔融廠 數百民眾銅鑼抗議〉。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341465>

由此可見，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會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改變、成長，從只呈現一方立場到正反並陳，陳治安經過思辯後，刻意選擇在採訪現場與社群成員保持距離，不參與土地抗爭運動、也不做客家文化的直接推動者，而是選擇當一個冷靜卻有溫度地敘述者。

報導實作：公民新聞如何改變現狀

2011 年，陳治安以報導〈苗栗生態浩劫 客家大院變牛蛙大院⁴¹〉獲頒公民新聞獎短片報導肯定。此則專題起因於苗栗縣政府，在生態池中流放外來種牛蛙，違反常識的行為嚴重影響了本土蛙的生存空間。

牛蛙的壽命比一般蛙類長，往往可活到十年以上，加上一對牛蛙每次繁殖可產下三萬顆以上的卵，而客家大院的排水系統只要雨季或是颱風天，牛蛙就可順勢進入後龍溪，對當地生態的衝擊不亞於福壽螺，……，對於放流來培育生物多樣性一事，只要營造好適合青蛙棲息的環境，自然就會有本土蛙類前來拓殖，並繁衍可容納的族群數量，這才是對環境及生物多樣性比較適合的方式。(2011 年 5 月 8 日，引自〈苗栗生態浩劫 客家大院變牛蛙大院⁴²〉)

陳治安一邊點出縣政府決策的荒謬、對生態造成的浩劫，一邊提出正確的生態觀念。他回憶，當時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在第一時間就發稿給四大報，但第二天卻沒看到報紙上出現隻字片語，心急與憤慨之餘，他只好自己前往拍攝，製作傳播效果較強的影音報導。

第二天剛好是星期六，我休假就趕快回來苗栗拍攝、剪成報導，到了星期一才有《蘋果日報》開始報導，其他媒體才開始跟進。……因為

⁴¹ 傑利 (2011 年 5 月 8 日)，〈苗栗生態浩劫 客家大院變牛蛙大院〉。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76402>

⁴² 傑利 (2011 年 5 月 8 日)，〈苗栗生態浩劫 客家大院變牛蛙大院〉。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76402>



六日是桐花祭如火如荼的展開，對客家縣市來說是很重要的活動，所以你可以看到主流媒體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好，他們有那種微妙微肖的關係，其實就是主流媒體的墮落。

陳治安質疑，主流媒體的視而不見，是地方記者為了桐花季給政府做的面子。「而且呢？主流媒體也是第一時間應該也是被搓湯圓，被拖了兩天才報導。」他表示這則報導也是 PeoPo 演講場合中，會被特別拿出來分享作為「由公民新聞引領主流媒體」的例子。

提到主流媒體，陳治安認為，公民記者仍無法取代主流媒體，在人力、技術、設備上強大的資源，但是公民新聞強化、補足了很大一塊的缺失，就是：「我們可以深入。公民記者散居在鄉鎮、鄉下或是原民部落也好，甚至是海內外都是，可以發掘很多、紀錄很多常民百姓、社區的故事。」同時，公民新聞的優勢就是沒有篇幅限制，因此在他報導裡都盡可能完整地，用影像來交代一件事。

新聞意理：同理心是公民記者共通的語言，新聞就在你我身邊

從大埔事件開始，陳治安一直在公民新聞上有所累積，最終引他進入現在職場——成為教公民新聞的講師。授課對象從國小學生，中壯年到退休人士都有，從授課內容上，就能一窺他的新聞意理及公民記者角色的認知。除了技術性的拍攝、剪接、過音外，另一大重點就是，公民記者要如何選擇新聞主題？

他會用自己的作品當範例，在哪邊教學，就用當地新聞題材，他就會告訴學生「新聞不是非得是台北的才叫新聞、高雄的才叫新聞」，新聞不在很遠的地方，在我們社區、身邊，就有很多值得採訪的故事。陳治安表示，很多學員會下意識的覺得「新聞是不是只能跟政治有關？」，因而感到害怕、不知該如何下手，他就會鼓勵他們從自己的「興趣」或「熟悉」的事物開始。

比起主流電視台，陳治安更喜歡看 PeoPo，因為裡面有各種不同的新聞，從



社區故事到社會運動，從生態環境到旅遊、教育文化。陳治安說這些新聞往往因為畫面不夠衝突、沒有人命關天，被判定「新聞性」不足，無法獲得主流媒體青睞，但他認為只要是發自內心想要去採訪的人、事、物，那就會是一則「好新聞」，他觀察到很多公民記者，都和他一樣有一顆「同理心」，想替弱勢發聲。

當我們能去站在別人的立場，或者是樹的立場、動物的立場，去看他們發生的事情，那你就會比較多的感同身受，然後就會想要紀錄他們，或是替他們發聲。

陳治安說，做公民新聞就是他參與社會的方式，透過鏡頭帶大家去了解社會脈動，他以志工服務來比喻，鼓勵每個公民都能拿起手機或攝影機，因為有心人都可以是「新聞志工」。

貳、 公民記者攬仁居修行生活網－洪春景

洪春景，1962 年出生於彰化大城鄉，畢業於台北師專（現已改制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科，曾獲台灣省特殊優良教師師鐸獎、曾任國小代理校長，退休後選擇定居執教生涯的最後一站——台東關山。因個人宗教信仰與深受南橫公路沿線居民、風景感動，從事此地區的影音文史紀錄超過 20 年，八八風災過後，目睹劇變的南橫，他整理多年累積的素材推出紀錄片《造林紀事_走過後山莫拉克》；為了爭取更多觀眾而加入 PeoPo，希望讓大眾看見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對人類、萬物生存空間的影響。參與專業影音工作坊之餘，他也不斷地自我培力，更將自己的人生哲學融入進報導中，展現特殊的新聞意理，他相信「真實」是新聞工作的根本，但事實查核要透過來「時間」檢驗，因此他盡力採訪、完整呈現不同立場的聲音，要替後人留下更全貌的紀錄。



社群關懷：與南橫公路的不解之緣

洪春景說，只要看過南橫公路至高點——大關山垭口壯麗、翻騰的雲海，你就不可能忘記她的美。對南橫公路的關注，起因於民國 70 多年一次騎機車登上向陽部落的經驗，當時的他飢寒交迫，一位林務局伯伯向他伸出援手，邀請他進入室內、端出熱呼呼的食物請他吃。「這個（舉動）整個溫暖了我的心，在整個南橫所遇到的人裡面，他們那種對人的關懷，是更甚過風景的。」

1989 年，洪春景就皈依清海無上師，在師父的指導下開始茹素、關心環境議題，當時師父正推廣吃素、環保、抗暖化的概念，希望有人能去記錄台東的好山好水，並透過無上師電視台傳播。正巧身為音樂老師的他，完成了於苗栗縣瑞湖國小採集客家民謠及泰雅文化的任務；就於 1997 年自願請調至台東，一來能做清海無上師的台東區聯絡人，二來還能研究自己喜愛的布農族八部合音。

請調的結果，讓洪春景來到位於南橫公路東段台東縣海端鄉霧鹿國小的利稻分校，他對南橫的影像紀錄也從這裡開始。1998 年因故轉至位於南橫公路入口的關山鎮的月眉國小，服務直到 2008 年退休。於此期間，他累積了大量關於南橫東段的影像紀錄以及部落文史調研。醉心於台東美麗山水與生活步調的洪春景，在退休後選擇定居關山，投入 3 公頃的造林生活，成為種樹農夫，更用「移民」一詞來表達他對此地的熱愛。

公民新聞的起點：推廣環境變遷紀錄片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重創南橫，令洪春景相當震驚，為什麼過去都說台東是最樂活、破壞最少的淨土，現在卻成了重災區。他獨自一人，帶著攝影器材，深入南橫公路尋訪風災中被破壞的 23 座橋及部落居民。他自述，當時完全是自發性地、出於一個簡單的念頭：「我們作為一個地球公民，應該為這個土地做一些事情。」



目睹劇變的南橫，讓洪春景決心要紀錄風災後的慘況，「特別是我在災前已經拍了那麼多美景。」投入台東重災區的影像紀錄、口述訪談，過程中他也有很深刻的反思：很多政府單位偏好宣揚某處已經重建、某地已經恢復等……但真的是這樣嗎？此外，他更害怕人類的健忘會讓災害一次次的重演。

因此，他著手整理過往累積的資料片段，將災後的地貌改變、在地居民感受彙整成紀錄片《造林紀事_走過後山莫拉克》，於八八風災屆滿周年時推出。當時他申請在公用頻道播出，此片罕見地在台東縣東台第三頻道播出長達一個月。為了讓更多人看到這部影片，洪春景拜訪公視在地記者章明哲，問他有沒有對外發表的管道，「他就說：『我們公視有個『PeoPo』啊，你可以加入公民新聞。因此2010年12月，他就以「欖仁居修行生活網」為名登記為 PeoPo 公民記者。

社群關係與實務觀察：公民記者的長期耕耘

2011年至2018年間，洪春景7度獲頒 PeoPo 公民獎，其中4次就是以南橫公路為題，他說得獎固然開心，但最重要的是透過他的報導，讓南橫公路上不同的群體的處境，能夠再一次被看見。

洪春景回憶，2013年，他為了參加公路總局於高雄縣桃源鄉（南橫西段）所舉辦的「永久性路廊」說明會，凌晨兩點多從台東關山（南橫東段）出發，因為南橫不通，他必須繞道南迴公路，從屏東經過高雄甲仙，才能進到桃源鄉。他說親自走一回就會知道，永久路廊對居民是何等的重要，豈料到了現場只有一家主流媒體出席，而且拍到了他要的鏡頭就離開。洪春景認為，這就是主流媒體資源分配不均、缺乏長期在地經營，沒有新聞敏感度的表現，而公民記者正好相反。

雖然不是從小在台東長大、也沒有原住民背景，但洪春景長期對於南橫公路生態環境與布農族人處境的關心，也獲得許多居民的信任與肯定，居民甚至會提

供第一手的災況影像給他，焦急地表示：「現在都（路）不通、（人）下不來，鄉公所聯絡不到，縣政府也聯絡不到，拜託你看看能怎麼樣」



雙重身分：公民記者與文史工作者

雖然我是公民記者，但我定位自己也是文史工作紀錄者。

把南橫公路沿線當成田野，長時間的蹲點、追蹤，讓洪春景對南橫議題有了更全貌的認識。除了桃源鄉外，南橫公路也是台東利稻部落唯一的聯外道路，當地居民甚至得簽下切結書，賭命搭乘流籠回家，但洪春景認為原鄉居民的艱辛處境是一個面向；工程人員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搶修，局處首長所背負的龐大壓力也是事實——政府有意協助，卻趕不上大自然反撲的速度。

觀察南橫公路逾 20 年，洪春景的新聞意理也深受其啟發。他感受最深刻的就是「時間會說話」，時間是進行事實查核最好的途徑。「現在很多的新聞，若干年後，它可能變成一個完全錯誤的資訊」。他以南橫為例，災後大家都談重建、談檢討，當時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政府也嘗試去做，但為什麼八八發生至今 9 年過去了，南橫全線通車的目標仍舊看不到盡頭，許多脆弱的路段，不斷地在修繕工程與天災破壞之間循環。

南橫公路影響了洪春景的新聞理念——不在快速、及時的新聞報導中做評斷。他寧可多花點時間、力氣，採訪所有能力所及、持不同立場的對象，「他（政府官員）講的我不會故意把重要的切斷，為了要成就災民，我會把他主要想表達的呈現出來。」然後再多花些篇幅，盡可能將採訪內容完整地呈現給觀眾。對他而言，這才是更值得留給後代子孫的珍貴的文史資料，「若干年後大家再回來看到到底是怎麼樣，那個時候下定論，才是比較正確的」。



報導實作：正反並陳與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結合

關心環境議題的洪春景，即便面對與自己立場對立的美麗灣開發案財團總經理，仍堅持保留他完整的發言，將他想說的話獨立成一篇報導，雖然與傳統新聞寫作上的「正反並陳」操作不同，但顯示公民記者仍有這樣的意識。

我就單獨把他 15 分鐘的談話獨立成一個。我願意讓正反方，雖然我沒有讓他在同一個影片中出現，但最少，在我的部落格的裡面，你可以找到完整的，贊同者（支持興建美麗灣）他們的想法。

洪春景認為，主流媒體的報導經常過於倉促，篇幅又有限，習慣渲染情緒，流於膚淺的資訊提供；因此，他站在公民記者的立場時，報導就引此為戒，花更多時間和空間來處理這些他周遭的議題。然而，以文史紀錄者的角色對田野長期的參與觀察，他體悟到：真理不一定能在當下被確定，因此選擇完整呈現各個面向和不同立場，提供給後世做評價。他將對主流媒體「求快」的反思，和對自己身為文史工作者「不論斷」的期許，一同展現在他的報導裡，顯示了他在公民記者與文史工作者的雙重處境中，找到一個平衡。由此亦可見，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形塑，與他所屬的社群、關心的議題特徵息息相關。

培力歷程：成為公民記者的路上

從傻瓜相機、V8、High8、DV、HD 一路拍到使用空拍機，洪春景說自己更偏愛「長期」紀錄，因此在技術的部份自學居多，雖然沒有正規訓練，「但就是以自己的眼光去取景、習慣她（拍攝主題）的美」。

加入 PeoPo 平台之初，受限於網站影音片長的限制，洪春景直接將紀錄片分段上傳，後續也收到不錯的迴響、甚至有平台的工作人員主動聯繫他。後續他參與了幾次蹺拍、2011 年的高雄影音工作坊，認識了其他風格不同，但精神都令人

敬佩的公民記者，不過由於個人習慣又加上居住在台東，與其他公民記者互動的機會與時間並不多。



洪春景自述，多年來他的影音技巧也有所提升，許多進步是來自觀眾的反饋。除了 PeoPo 外，他也會將影片上傳到臉書社團，如：南橫山林同好社團、HD club 或 YouTube 等。有人會針對他的旁白配音節奏給予建議，他的作品甚至吸引作曲家姜建軍主動聯繫，義務提供總計 50 首的配樂，《南橫的美麗與憂愁~2018 南橫紀事⁴³》紀錄片上傳至今，在不同平台累計已超過百萬人次點閱。

新聞意理：「真實就有力量」

「千萬不要小看你隨手的紀錄。」洪春景總在受邀分享時這麼說。2012 年 8 月底襲台的天秤颱風路徑特殊，兩度經過台灣東南部海域，蘭嶼災情慘重，卻因供電、通訊狀況不穩定，主流媒體資源又多集中於本島，不易掌握在地災況。8 月 28 日，洪春景在臉書上看到蘭嶼椰油國小顏子喬老師發表的第一手災區照片，取得其同意後製作成報導，短短幾小時內就有上萬次點閱，並成功引起主流媒體跟進報導。8 月 29 日，洪春景再次追蹤，以電話訪問蘭嶼東清國小溫昇勳校長，才得知當地災情主要集中於迎風面，他隨即再做報導更新、更正資訊，「蘭嶼的災情只是一個點，他不是全面的，所以作為公民記者，我有這個社會責任，必須要把真實的情況告訴閱聽眾、去做澄清。」

洪春景認為，新聞最高的價值就來自真實，因為「真實就有力量、真實就有美感，它就可以感動人心。這到底是什麼時候給我的概念？也許是因為公民新聞。」他說他不像讀新聞傳播的，有個具體的歷程，去思考新聞的價值或報導該怎麼呈現等等；這個信念或許是接觸了公民新聞以後，在一則則報導中養成的。

⁴³ smbigsun 洪春景（2018 年 8 月 9 日），〈南橫的美麗與憂愁~2018 南橫紀事〉，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8H_4HAvs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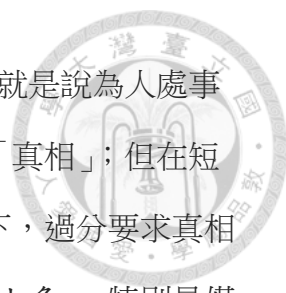
話鋒一轉，洪春景則對近日主流媒體的現狀與表現感到憂心。「當前新聞一個很重要的盲點：為了要搶即時和頭條，所以有太多的東西錯誤百出」，2018年2月6號花蓮發生規模達6的強震，洪春景前往現場賑災，無奈卻看到媒體為了搶快，在消息未明時先做定論，嚴重影響受害者家屬情緒。他回憶到，當時共有兩人獲救，一個生命狀況確認穩定，另一個狀況未明，但記者就直接對外宣稱兩人的生命跡象皆穩定。「你知道嗎？那個媽媽聽到以後她好高興，結果最後呢？又說她兒子冰冷的遺體已經推出來」。

洪春景認為，進行事實查核、傳遞正確資訊是新聞從業人員的基本功，但主流記者卻做不到，連台東在地記者都搞不清楚南橫與南迴的差異，實在不應該；另外，他也對近年台東地方記者的縮編，感到憂心：平面記者還有分區，但電視台只會分派一個記者到台東；他形容，台東縣的腹地狹長，若最南邊有新聞、海端也發生一件事，他光來回都分身乏術。「媒體要什麼獨家、獨家，其實我們做的每一則都是獨家」洪春景說，這就是公民記者、獨立媒體在地方的發展空間。

新聞意理：新聞應該是什麼？

洪春景表示，每位公民記者接觸的層面不同，也許我們接觸的人、事、物這些公共的議題中真的有問題，那我們就必須要呈現；倘若沒有接觸到「當然就不會刻意，不希望、我也不認為，你就必須要去到處去找，那是雞蛋裡挑骨頭。」洪春景認為，新聞應該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報導可以批評，但不要為了渲染情緒而批判，而要有「建設性」地提出怎麼樣可以更好。

談到如何定義新聞，洪春景認為這是其實是「眼界」的問題，現在的媒體過度強調，新聞一定要跟公共議題直接相關，但以他來看，任何事情都是新聞，因為世界瞬息萬變卻又都環環相扣，「如果一隻蝴蝶在那裡飛，你認為他和公共議題有關係嗎？說起來沒關係，但是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是沒有關係的。」



自詡為修行人的洪春景說，五戒中有一項是「不妄語」，也就是說為人處事至少要不說謊、不搬弄是非。放到記者身上來說，就是要追求「真相」；但在短時間內，我們所理解的往往是片面的事實。因此，在時間限制下，過分要求真相有時候會變得偏頗，「看到什麼，你紀錄什麼，其他的不要加上太多」。特別是媒體，要為人民把關第一手的資訊，更要小心查證、警慎行文，不要引導大眾到錯誤的方向。「知之為知之，知為不知，是知也。」洪春景認為，要扭轉當前的媒體亂象，首先就要摒棄記者、媒體應該要無所不知、先知先覺的觀念。

第三節 小結

本文研究對象皆屬於對特定議題、社群有長期關懷的公民記者，於此共同特徵之上，他們展現出許多共通點。他們皆為了實現對社群的關懷而成為公民記者，並同意新聞工作的本質是對真實的追求，公民新聞的優勢在於不受篇幅限制，因此能更完整的紀錄事件真實的樣貌。他們相信新聞就在身邊，只要報導能成功喚起讀者的共鳴就有意義，用多少人會有興趣來評估新聞價值，往往會忽略在地、弱勢的聲音。長期地參與，讓他們社群議題有「熟悉」與「深度了解」，因此不會刻意強調衝突、新奇的場面，反倒更關注日常生活的全貌；在享有編採優勢的同時，無論有沒有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同樣面臨社群身分認同／公民記者職能的雙重處境，具體體現於新聞選題、報導手法以及報導責任上。

五位受訪者都是經不同類型的培力。為了提升自己公民新聞報導的傳播效果，他們也會主動尋求其他的培力管道；在平台培力的部分，多位受訪者提到記者典範的出現，影響了他們對記者自主性、獨立性的新聞專業認知。在採訪實務的現場，他們會連結過往的閱聽人經驗，當前主流媒體、公民媒體進行反思，並調整、型塑自己的新聞意理。他們皆曾透過自己的報導，解決社群問題，報導所

發揮的影響力，使他們更確定自己的新聞實踐，即使有些技術不那麼純熟、報導的議題相對冷門，但只要堅持傳遞真實的資訊，就有被看見的可能。

除了相似之處外，局內人公民記者各屬不同社群，參與社群日常、自身情感涉入的程度也各異；簡單來說，「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親密程度，影響了他們在參與觀察中的角色位置與新聞意理。

表四：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意理類型

	觀察型「參與者」	參與型「觀察者」
社群認同	認同強，受社群羈絆影響深	有認同，但仍有辦法抽離
社群關係	好朋友 較緊密、熟悉，甚至是內部成員	善意的熟面孔 知道彼此、認得但不親密
參與日常	頻率高	需刻意移動到田野現場
採訪語言	族語、行話、暗號	—
敘事角色	現身的當事人	敘述的關係人
報導立場	親近／有利於社群成員	忠於對新聞事件自身的判斷
報導責任	重視對社群成員所造成的影響	較不明顯

在本章一、二節中，筆者將局內人公民記者分為「觀察型參與者」及「參與型觀察者」兩類，透過受訪者自述的生命歷程，進入他們的思緒與了解其意理形塑的關鍵，以下筆者將進一步詮釋分析、比較，立體化兩類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雖然這兩類局內人公民記者都是田野中的參與式觀察者，但在報導理念上又可分為偏向參與者和偏向觀察者兩種意理類型，呼應了參與式觀察法中研究者角色的類型光譜，故本研究使用「參與者意理」和「觀察者意理」進行討論，以釐清局內人公民記者的特殊性和價值。



一、參與者意理

在局內人公民記者中，有一群人他們實際參與社群日常，以及自我情感涉入程度都很高，對自身社群處境、發展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們對原社群有深刻的了解，能向外傳遞內部成員的心聲，亦能扮演和外界的橋樑角色，讓社群成員能掌握社群外的想法，促進兩造之間的理解。

他們往往具有更強烈的報導意圖，有明確的事件、議題、理念要進行倡議，因此不會為了要平衡報導，刻意納入與社群立場相左的聲音；更偏好採取對社群有利的報導視角，以凸顯由社群的聲音與訴求，達到強客觀性的目標。他們與新聞報導中的受訪對象，往往在私領域還有更親密的人際關係，可能是親戚、朋友、同事或社會運動夥伴等。在採訪現場，公民記者就是日常參與者（ordinary participant）有明確的「內部」身分，能直接使用社群成員熟悉的語言進行採訪、交流，如：族語、專業術語（行話）、共享的暗號（地名暱稱）等，無須經過轉譯，一來能避免雙方因語彙理解的不同所造成的資訊誤讀、誤判；二來也能製造受訪者的熟悉感，使其卸下心房。從受訪者的觀點來看，他們就是平常一起相處的朋友，能自在地發言，不必擔心公民記者會扭曲；也能呈現自己真實的日常生活，對於核心、敏感的資訊，不會像面對外人時刻意隱藏。對於受訪者來說——他能夠做他自己，因為雙方都清楚互相之間的底線。

信任感，讓他們得以進入更私密的採訪主題與空間，但同時也背負更多社群期待，以及伴隨著自身使命感而來的報導責任。面對雙重處境，他們在社群身分及公民記者身分之間游移，希望能兼顧社群同理心與傳播效果，但最高指導原則仍是對社群成員負責、對自己負責，因此即使外部閱聽人，可能會對其報導客觀性有所質疑，他們也不介意在鏡頭前露面，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播報。

以本文研究對象為例，由社群使命感及做不同群體間的橋梁所貫穿為成的「觀察型參與者」，又因所屬社群之不同，而有不同的使命。身為排灣族公民記



者的巴戈，以部落文化傳承為使命，對內推廣族語、培養部落青年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對外傳遞原住民族的心聲，他要做異文化中介者。做為地質、水保技師的陳本康要當專業知識中介者，對內提升同業的凝聚力，對外將生硬乏味的專業知識，變得更生活化。身為環保 NPO 工作者的吳慧君，以培力居民為使命，對內協助受害的居民建立自主論述的能力，對外透過公民新聞報導，培養大眾對環境議題的重視；自由不受限的公民新聞平台，正是實現他們使命感的最佳場域。

二、觀察者意理

在局內人公民記者中，有一群人他們長期關心特定議題，雖不是社群日常的參與者，但也獲得了社群成員的肯認與信賴。不同於觀察型參與者受社群羈絆較深，抱持著觀察者意理的公民記者，是自己選擇了一個理念，為了理念而主動地去親近相關的社群。

他們因為沒有時時刻刻置身現場（田野），參與社群內的日常活動，在報導時相對能將情感抽離。縱使對社群或議題有自己的意見觀點，在報導中也不會顯露自己的立場，仍能冷靜地考量其他面向。對受訪者而言，他們被視作「善意的熟面孔」，關係雖不如好朋友般緊密，但受訪者因信賴公民記者，仍會主動提供在第一現場拍攝到的畫面、資料。

以本文研究對象來說，陳治安或洪春景都關心生態環境，因此願意付出額外的時間、精力，前往新聞現場進行拍攝。其所關照的環境，在微觀層次下就有所謂的區域範圍，如陳治安關心家鄉苗栗的生態、動物，洪春景關心南橫公路，因為地緣的關係，在報導期間仍會與人有所接觸；但最終的目標都是替生態環境發聲，因此眼界也更為開闊、能關注議題的全貌，更願意考量同樣生活於這塊土地上，各執不同立場的群體是如何思考。展現在報導風格上，就能做個相對的客觀卻又不失溫度的公民記者。從訪談資料來分析，陳治安理想的記者角色，是做有同理心、替無聲者發聲的代言人，洪春景則自許成為不斷論的文史紀錄者。

第五章 結論



本文使用深度訪談法，並利用 Junker（1960）提出之研究者在參與觀察中的角色位置，探討我國局內人公民記者，如何形成他們的新聞意理，及有何異同。結論章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總結研究結果並進行討論；第二節為研究貢獻與限制；第三節為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果與討論

壹、 研究結果總結

如第一章所述，我國公民記者群像中，有一群人帶著自己原有社群身分及理念來當公民記者，身為局內人的他們，打破了新聞學傳統上「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要保持一定距離的想像。本研究從此出發，希望能探究我國對特定社群／議題有深度參與觀察的公民記者，他們如何形成自己的新聞意理，又有何異同。基於研究關懷及局內人背景設定的特殊性，因而引入人類學參與式觀察法及本土人類學家的概念，分析田野中的角色位置如何影響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

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本研究先回顧新聞專業意理的內涵，歸納出對新聞真實的追求、客觀性意理以及新聞價值，可以做為探討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重要面向；並於現有文獻中發現，從公民記者的來源、動機、如何選材上來看，確實能發現局內人公民記者們的身影，並歸納出他們可能來自的社群。接著，本文回顧參與式觀察法，指出根據研究者的參與程度，以及研究身分是否有被察覺，能決定研究者在田野中的角色位置，並會影響其在蒐集資料及書寫兩階段的策略；本研究認為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同樣會受到田野中的角色位置所影響，因此提出將研究對象分「參與型觀察者」與「觀察型參與者」兩類做比較，以利後續討論與分析。最後，回顧本土人類學家的定義與特徵，發現局內人公民記者的

新聞意理，亦可能也會受到「社群自我／公民記者（專業）自我」的雙重處境影響並展現在他們的報導中。



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部分，本研究從我國最具規模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中，挑選各具不同關懷、社群身分，又曾獲公民新聞肯定的公民記者為研究對象；使用深度訪談法，跟著公民記者語言的思緒，進入他們的社群經驗與公民記者歷程，掌握他們對自身行動的意義詮釋。

經研究分析後發現「參與型觀察者」與「觀察型參與者」此兩類局內人公民記者，所抱持的新聞理念有交集，也有差異，但整體而言仍展現出從「參與者意理」到「觀察者意理」的光譜差異，前者與後者間並非能一刀兩斷的子集，亦呼應理念型分析的特徵。意理奠基於個人生命經驗與價值觀，無法輕易切割，縱使是社群認同深的公民記者，在某些情境下亦會展現觀察者意理，反之亦然。

總的來說，持參與者意理的公民記者，在新聞現場與報導立場上，會更親近社群成員；當面對社群身分／公民記者身分的雙重處境時，會更偏向選擇忠於社群自我，評估報導對社群所造成的影響。他們會透過不同的報導手法，帶著自身社群身分現身於報導中，對社群的處境與未來有更強的使命感；持觀察者意理的公民記者，因為與受訪者的關係沒有那麼緊密，雖然對社群或議題有自己的立場，但相對能客觀、冷靜地關注更多面向，面臨雙重處境時，只需忠於自己對報導議題價值判斷，無須受制於社群情感。

本研究發現，持參與者意理的公民記者，其社群身分認同多源自族群意識與職業歸屬，前者與生俱來，尤其當族群處於社會中相對弱勢的地位，共同對抗霸權的集體意識，以及貢獻社群的使命感也更為強烈；後者對青壯年就業人口而言，工作是他們生活中成就、自我實現的主要領域，當工作與個人信念能相互結

合，並投射到公民社會與實踐上，對社群的認同也會更加強烈。而持觀察者意理的公民記者，他們的社群認同歸屬，通常是忠於自己所選擇的理念。

從研究對象中歸納出的社群包含：族群、職業、特定理念、地方／社區。

「社群歸屬」各自有其特性，影響公民記者們受到社群羈絆的程度。研究發現以特定理念、地方／社區意識為認同歸屬的公民記者，不像族群身分、職業歸屬，對個人生活那麼具主導地位。

同為局內人公民記者，他們帶著與社群交織的生命經驗，通過培力成為公民新聞的行動者，做為社群成員或是關係人，替社群／理想發聲，才是這群公民記者新聞工作的核心。呼應本土人類學家的概念，不論他們有無自我意識，在其採訪與報導書寫階段，都能看見多重身分所帶來的優劣，以及面對雙重處境因應而生之顛覆既有新聞想像的實踐策略。他們一致認同公民記者報導要基於事實、追求真實，但在對客觀性意理的詮釋與評價上，比起制式化的客觀性寫作常規，更強調透過公民新聞，傳遞他們生命經驗中的體悟與感知，以達成自我發聲或替弱勢發聲的社會實踐意義。

貳、 討論

現有文獻從傳播賦權的視角出發，指出 PeoPo 平台培力是影響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原因之一，不過僅止於活動基本資料的描述；本文更進一步從訪談中這些活動對公民記者們的意義。工作坊中所邀請的講師，有些人會成為公民記者們心中「記者典範」。出自於對講者的強烈認同，公民記者會進而仿效其報導手法、新聞實踐及新聞理念，影響他們對記者角色的認知。另一方面，多位受訪者曾受邀擔任 PeoPo 分享講者，他們表示在準備演講內容的過程中，也重新回顧自己的公民新聞經驗、再次梳理、定位自己做為公民記者所欲扮演的角色。



公民記者對主流媒體的反思，包含加入公民記者前的閱聽人經驗，以及加入後在相同議題上，自己與主流媒體報導視角、呈現手法選擇上的差異。部分受訪者投入公民新聞產製前後，對主流媒體的批判保持一致，企圖透過自身公民新聞實踐，提供組織記者一種新的思維模式；也有受訪者在當記者後，更體會新聞從業人員處境的難處，進而從批判轉為接受但不認同，並重新評估對新聞常規與自身新聞理念之間的關係。

從一般民眾變身為公民新聞的貢獻者，這群行動者帶著強烈的個人色彩、初始動機，在成為公民記者的這條路上，綜合過往生命經驗中的社群認同、社群關懷、閱聽人經驗，在培力歷程、實務現場中遇到關鍵的人、事、物，不斷地修正並形塑了他們現在所持的新聞理想。在動態的公民新聞實踐與反思歷程中，不論公民記者有沒有自覺，本研究認為，最終他們都培養了一股「公民意識」，或許其平常的新聞實踐看起來更偏向於（文史）紀錄，但當社群或公民社會有需要，或當他們偶然置身於新聞現場的時候，其透過經驗的積累油然而生的新聞感（news sense），是一般公民所無法擁有的；他們與社群的緊密連結與對社會脈動的敏銳，也是傳統記者無法企及的。

總的來說，他們所抱持的意理，難以在主流媒體環境中實現，因此做公民新聞，不單是要替自己所關心／所處的社群成員發聲，更是他們對自己負責任的表現。專業記者對於報導議題的參與程度、情感涉入，不如局內人公民記者深，新聞媒體機構對於產量、截稿期限的要求，也限縮了他們的採訪空間與最終產品的呈現，但公民記者就不受此限。對公民記者來說，做報導就是一個自我書寫歷程，他們在採訪現場／社群田野中，不斷地從最平凡無奇的生活細節觀察起、參與文化中具共享意義的活動，對自己、對社群、對外部的一切賦予意義；新聞實踐中的每個選擇，都幫助他們更了解自己，重新定位自己與所屬社群之間關係。如果說人類學是研究特定文化之中的人如何安身立命的學問，那麼本文的研究對

象們，同樣也是在社群與公民新聞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地思考，並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過去討論職業記者專業意理時，往往是以閱聽人為出發點，以記者應為大眾扮演什麼角色（解釋者、對立者、資訊傳播者）來思考，為了讓爭取多數人的接受、相信，客觀性意理漸漸成為一種可行方式；不過，局內人公民記者心中所預設的讀者，不一定那麼「大眾」，他們同樣追求報導的效果，卻不是以觀眾的多寡為標準，而是以對社群的實質影響力為依歸，因而更多地觀照「自己」在報導產製過程中的意義。即，面對雙重身分發生矛盾時，局內人公民記者反問：什麼才是自己做公民新聞的初衷？我選擇承擔的責任與使命是什麼？

本文認為，正是公民媒體提供了一個更自由、更開放的空間，讓公民記者們更能在長期參與觀察中，體驗自身主體的流動性與不確定性，轉而既擁抱社群身分所伴隨的情感，同時也承認自己雖然無法胸懷絕對的客觀、公正，但仍然嘗試找出合適的標準。

從這群公民記者在報導中的現身程度，不難發現他們與客觀性意理之間的距離，但正如本土人類學家之於人類學學科的意義，他們的價值不在於提出一個「更好」的洞見，而是在於他們的「不同」。使用客觀性意理、傳統寫作常規檢驗公民記者的報導，忽略了這群公民記者做為行動主體的特殊性，以及蘊含其中珍貴的社群價值；比起傳統新聞以「公共性」一言以蔽之的評判標準，他們的報導對社群、之於自己的意義，不只更細膩，也更為重要。

除了雙重身分的處境外，從研究對象自述的內容中，也能看見學術研究中討論本土人類學家時，另一項重要的概念意涵：做不同文化間的橋梁。公民記者善用自己的局內身分，在蒐集新聞資訊上掌握絕對的優勢，能向外人更真實地說明社群中難以捕捉地思維模式與情感。來自不同背景、社群的公民記者投入新聞產

製，亦有助於提供主流媒體框架外報導，這些不同面向的部份真實，幫助我們更接近真實的全貌。

當然，以本土人類學家作為類比，不可能完美無缺。局內人公民記者雖然不像專業記者一樣，每日發稿，但報導產出的頻率仍高於人類學家，製作公民新聞報導是相對常態的實踐。他們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反覆琢磨自己做為公民記者的主體位置、與社群成員（受訪者）之間的主體位置，以及身為社群自我（局內人）的主體位置，在反身性的行動層次，表述自己在特定情境下的行為有何意義，有些人甚至能進一步，針對特定的社會行動進行自我釐清。

本土人類學家的出現，是希望能在知識上突破過去的「西方——非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競逐的權力結構，去改變整個人類學的研究典範，挑戰研究者立場以及掌握知識話語權的主體；不同於職業記者，局內人公民記者更專注於對自身社群的改善，他們並沒有意圖以「公民記者」的身分去挑戰新聞學的原理和信念，成為一個專屬職業，也沒有要爭奪資訊守門人或行使第四權的唯一合法地位，自然也就不會被鎖定於特定的權力結構與常規的思維模式之中，因而能對公民社會做出不一樣的貢獻。

本研究視角的價值與突破，就在於為公民記者以及其公民新聞實踐，提供除了新聞學外的討論理解方式，一來可以回應源自於對客觀性意理的操作差異招致不安與疑慮，二來也能以更貼近公民記者主體意識的觸角延伸，重新思考公民記者對新聞學與公民社會的價值與貢獻。

第二節 貢獻與限制



壹、研究貢獻

一、局內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與類型

本研究補充了對於公民記者中，對於自身社群或特定議題有所觀察、關懷的那一群人的新聞意理，理解他們以什麼方式思考新聞，又使用什麼策略同時實現社群認同和記者職能，並以參與式觀察中的角色位置，更細緻化地針對他們參與社群的程度進行分類。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提供了更貼近公民記者主體意識的公民新聞意理圖像，未來的研究者可於此出發，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檢驗他們所共享的新聞理念，幫助建構公民新聞意理，讓公民記者能在保有其特殊性與異質性的同時，仍能有一個共同的工作倫理存在。

引入人類學參與式觀察法，以公民記者的社群參與程度，及「記者」身分被社群成員覺察的程度，做為公民記者分類依據，顯示「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關係的親疏遠近，與其隨之而來的報導優勢與責任，是影響公民記者內部，以及公民記者與傳統記者之間意理與實踐產生差異的原因。為既有學術討論上，提供一個以是否有薪俸、受雇事實，或是否受過正規新聞訓練之外，定義公民記者概念的判斷依據。

現有文獻已透過內容分析法，發現公民記者們在報導實作上，與傳統新聞學強調的客觀性意理，或新聞寫作常規有所不同，不過卻沒有針對這種差異進行解釋或分析。而本文的研究發現，或許能提供一種可能的解答視角：公民記者的社群身分，包含社群認同及與社群成員的關係，讓他們在報導時需要承擔局外記者無須背負的社群責任，因此公民記者在報導手法上的不同，可能就是為了忠於社

群身分的一種策略。本研究發現「社群認同」是影響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重要因素，提供了「賦權、培力」以外的新視角，值得未來研究再進一步探討。

此外，本文所提出的分類標準與歸納出的意理角色類型，如：異文化間的中介者、具同理心的代言人、不斷論的文史紀錄者，對有志於從事公民記者培力的組織或平台而言，不失為一項有用的資訊，一來能找到更有潛力成為公民記者的族群，二是能根據公民記者的意理目標，提供更適當的培力課程。

二、深度訪談更能展現公民記者的能動性與主體性

過去討論常民如何成為公民記者的研究，多從平台的使用與滿足研究或加入動機出發，通過問卷進行調查，將他們從被動的閱聽人變身主動的新聞產製者的行動變化，視為單一時間點的改變，卻無法解釋為何很多人都有分享的動機，也聽過或經過公民新聞的相關培力，但真正願意嘗試或持續做公民新聞報導的人數不如預期。本文使用深度訪談法，就是為了連接起這中間的落差，透過公民記者自述其過往生命經驗與投身公民新聞產製的關係，捕捉此行動轉變的動態歷程，彰顯、歸納出其中的關鍵因素。

國內針對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研究，僅見於洪婉甄（2009）使用修正式得菲法，通過問卷調查檢視傳統新聞專業意理中，專家與公民記者們有共識的部分，將其納為我國公民新聞意理的內涵，其研究結果雖指出公民記者的新聞意理有其特殊性，卻未能替差異提供更有脈絡的解釋；此外，以傳統新聞學專業意理的構面設計問卷，一是未能展現公民記者的主體性，二來也可能有所遺漏。而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法，正能補充此不足，讓公民記者成為他們新聞實踐的詮釋主體，通過他們自述的公民新聞實踐經驗，立體化其新聞意理，以及其意理形成、改變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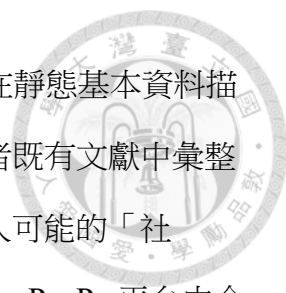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法，此途徑有助於讓研究對象以自己的語言，闡述自己的價值觀與賦予自身行動意義，更能看見受訪者過往經驗的深度與厚度，但由於訪談仰賴受訪者主觀的回憶，可能因為時間久遠或是發現了研究者的意圖，而遺漏或選擇隱藏了重要的關鍵。因此本研究也通過整理訪談內容、閱讀／觀看公民記者自製的報導，並參閱公民記者過往的專訪、得獎感言等二手文獻資料，以達到三角檢驗的目的，並針對受訪者所提及的客觀事實，進行查核與了解，補足深度訪談法之不足。此外，本研究奠基於研究對象的主觀經驗敘述，而每位受訪者都有其特殊的經驗歷程與主體性，並無法像量化研究般進行類推。

不過這樣的研究途徑，更能捕捉新聞意理做為一種抽象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在研究對象過往的生命經驗中被培養、形塑，以匯集在不同、特有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下，受訪者對其經驗的感受、行動意義的詮釋。是以，若通過量化研究的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就難以看見受訪者意理形塑的動態歷程與更深刻的意義。同時，做為一項對公民記者新聞意理的初探型研究，深度訪談的開放性與彈性，更能協助發展新理論或找到過往研究中所忽略的其他關鍵。

以外，意理類型做為一個理念型分析，其分類的強制性，勢必導致某些細節的遺漏。每一位局內人公民記者，在社會中有多重身分角色，不僅具有單一的社群身分，因此在不同情境、報導議題之下，可能展現出不同的意理內涵，但由於研究關懷、以及研究者的資源條件，因此本研究所討論的「社群認同」僅專注於受訪者自我認知中最為突出的社群角色，並未能對其他公民記者所報導的議題進行深入的剖析。

另外，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局內人公民記者」，但由於我國對公民記者尚未有大規模、深入的調研，因此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可能有所遺漏。既有文獻中對



公民記者群像的掌握，多以 PeoPo 平台註冊資料為基礎，停留在靜態基本資料描述，如：性別、教育程度、地區分布、行業別等。是故，研究者既有文獻中彙整透過公民記者的來源，或參考他們新聞取材之途徑，找到局內人可能的「社群」，再進一步檢閱二手檔案資料，如：公民新聞獎的活動手冊、PeoPo 平台中介紹公民記者的節目、以公民記者為主題的受訪影片或專題報導等，以確認研究對象符合研究旨趣，因此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可能對局內人「社群」有所遺漏，或是有其他符合條件的受訪對象，因為缺乏間接的訪談或檔案資料，以致於無法被研究者所發掘。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聚焦討論我國公民記者群像中，對特定社群／議題具有長期且深度參與觀察的本土人類學家，發現「社群認同」是影響其新聞意理形塑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歸納出幾個特殊的記者角色認知，可供未來研究者在此基礎上，更深入、細緻地討論他們的意理類型。例如，研究者可以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對象選取標準，找出本研究發現之——族群、職業、特定理念、地方／社區——等社群外，其他可能形成認同與歸屬感的場域。

此外，亦能在本研究的基礎之上，挑選同質性更高的研究對象，檢驗本研究發現的記者角色與意理，是否為相似背景公民記者所共享。例如：都以部落公民記者或具少數族群身分的公民記者為研究對象，探索他們是否都有扮演不同文化之間的「中介者」的理想。特定職業的專業人士，如：醫師、律師，是否也認同要做傳遞專業知識的中介者。或是通過本研究發現的幾個公民記者意理角色，如：異文化間的中介者、替無聲者發聲的代言人、不斷論的文史紀錄者，加以討論其意理的異同與成因。

對若能從對媒介功能、記者角色或意理位置切入，釐清公民記者為了實現特定目標，保持著怎樣的意理、採取了哪些策略，一是能深化公民記者意理相關研究在學術上的討論與內涵，二是對有心打造公民媒體、培力公民記者的個人或組織來說，這更有助於發掘、理解不同背景的大眾，成為公民新聞的行動者的潛力何在？又何種鼓勵與宣傳，能使公民新聞與公民記者理想中的社會實踐目標更為一致。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 王晴玲（2007）。《公民新聞的在地實踐-公視 PeoPo 新聞平台公眾參與及多元報導研究》。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贈凱（2009）。〈公視 PeoPo 公民新聞網站使用與滿足研究〉，「2009 傳播管理學術研討會」，台北。
-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2011 年 7 月 29 日）。取自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689>
- 吳秀瑾（2005）。〈女性主義立場論與社會習性〉，《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3): 653-682。
- 林徐達（2011）。〈論地方知識的所有權與研究職權：從詮釋人類學的觀點省思 Lahuy 的 [論文返鄉口試]〉，《台灣人類學刊》，9(1): 147-185。
- 林淑馨（2010）。《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台北：巨流。
- 林開世（2016）。〈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考古人類學刊》，84: 77-109。
- 邱千瑜（2008）。《新媒體閱聽人、公民新聞與公共媒體－新媒體使用者如何看待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洪婉臻（2009）。《公民新聞學專業意理：挑戰與建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胡元輝（2007）。《媒體與改造：重建台灣的關鍵工程》。台北：商周。
- 胡元輝（2017）。〈建制化的侷限與超越：台灣公民新聞的十年發展〉，「2017PeoPo 公民新聞研討會」會議手冊，5-6。取自
<https://www.peopo.org/events/2017CS/2017PeoPoAA.pdf>
- 胡幼慧（主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 孫曼蘋（2009）。〈公民新聞 2.0：台灣公民新聞與「新農業文化再造」形塑之初探〉，《傳播與社會學刊》，9: 153-180。
- 高淑清（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麗文文化。

- 張隆志（1997）。〈追尋失落的福爾摩莎部落——台灣平埔族群史研究的反思〉，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合編），《台灣史研究一百年》，頁 257-272。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郭珮君（2010）。《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三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形塑與實踐》。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陳向明（2000）。《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陳順孝（2008 年 5 月）。〈「公民記者」應是土著人類學家〉，阿孝札記。取自 <https://axiao.tw/%E5%85%AC%E6%B0%91%E8%A8%98%E8%80%85-%E6%87%89%E6%98%AF%E5%9C%9F%E8%91%97%E4%BA%BA%E9%A1%9E%E5%AD%B8%E5%AE%B6-310da51466a7#.p5mt4k8a2>
- 陳順孝（2012）。〈網路社會動員的繼往開來：反國光石化運動的社會科技基礎和行動策略演化〉，《傳播研究與實踐》，2(1): 19-34。
- 彭家發（1994）。《新聞客觀性原理》。台北：三民書局。
- 黃樹民（2011）。〈人類學與民族學百年學術發展〉，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頁 173-197。台北：聯經出版社。
- 管嫫媛（2008）。《台灣 1980 年代《自立晚報》社會運動線記者的專業意理形成與實踐》。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齊力（2005）。〈質性研究方法概論〉，齊力、林本炫（合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頁 1-18。嘉義：南華大學社會所。
- 劉建明（2003）。《當代新聞學原理》。北京市：清華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
- 蔡士敏（2008）。《自立事件核心記者的生命故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鄭宇君（2014）。〈災難傳播中的群體力量：社交媒體促成新型態的公民參與〉，《傳播與社會學刊》，27: 179-205。
- 蕭戎（2008 年 2 月 1 日）。〈地方知識的回歸—記 Lahuy 在司馬庫斯的論文口試〉，Oikos-Taiwan 部落格。取自 <http://oikos-taiwan.blogspot.com/2008/02/lahuy.html>
- 蕭博仁（2009）。《草根媒體在地扎根之探討—以公視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為例》。南台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英文文獻

- Allan, S. (2013). *Citizen witnessing: Revisioning journalism in times of crisis*. Cambridge, UK: John Wiley & Sons.
- Andén-Papadopoulos, K., & Pantti, M. (2013). Re-imagining crisis reporting: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and citizen eyewitness images. *Journalism*, 14(7), 960-977.
- Bird, S. E. (1987).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relevant for journalists. *Journalism Educator*, 41(4), 5.
- Bird, S. E. (2010). Anthropological engagement with news media: Why now? *Anthropology News*, 51(4), 5-9.
- Blood, R. W., Putnis, P., & Pirkis, J. (2002). Mental-illness news as violence: a news frame analysis of the reporting and portrayal of mental health and illness in Australian med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2), 59.
- Bowman, S., & Willis, C. (2003).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www.hypergene.net/wemedia/
- Campbell, E., & Lassiter, L. E. (2014). *Doing Ethnography Today, Theories, Methods, Exercises* (1st ed.). Somerset, UK: John Wiley & Sons.
- Clifford, J., & Marcus, G. E.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hen, B. C. (1963).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ward, R. (2013). *Speaking personally: the rise of subjective and confessional journalism*.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Cramer, J., & McDevitt, M. (2004). Ethnographic journalism.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taking it to the streets*, 127-144.
- DeFleur, M. L. (1991). *Understanding mass communication* (4th ed. ed.).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 Della Porta, D. (2014). In-Depth Interviews. In *Methodological Practice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pp. 496).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tenber, B. H., Gotlieb, M. R., McLeod, D. M., & Malinkina, O. (2007). Frame

intensity effects of television news stories about a high-visibility protest issue.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0(4), 439-460.



Deuze, M.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6(4), 442-464.

Durham, M. G. (1998). On the relevance of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to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The case for “strong objectivity”. *Communication Theory*, 8(2), 117-140.

Emerson, R. M., Fretz, R. I., & Shaw, L. L. (2011).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him, H., & Helmer, K. (1980).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A Further Elabor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21(5), 644-663.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Geertz, C. (1995). *After the fact :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lmor, D. (2006).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Reilly Media.

Grindal, B. T., & Rhodes, R. (1986). Journalism and anthropology share several similarities. *The Journalism Educator*, 41(4), 4-33.

Gwaltney, J. L. (1976). On going home again — some reflections of a native anthropologist. *Phylon*, 37(3), 236-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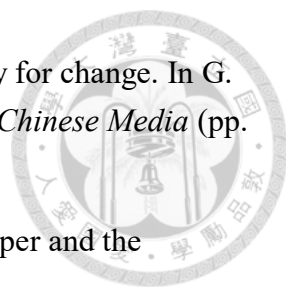
Hamdy, N. (2009). Arab citizen journalism in action: Challenging mainstream media, authorities and media laws.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culture*, 6(1).

Hanitzsch, T. (2007). Deconstructing journalism culture: Toward a universal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17(4), 367-385.

Harding, S. G. (1991).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M. (1976).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mic/etic distinc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5(1), 329-350.

Hastrup, k. (1993). The native voice—and the anthropological vision. *Social Anthropology*, 1(2), 173-186. doi:10.1111/j.1469-8676.1993.tb00249.x

- 
- Hung, C.-L. (2015). Citizen journalists as an empowering community for change. In G. D. Rawnsley & T. R. Ming-yeh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Media* (pp. 161-17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Janowitz, M. (1975). Professional models in journalism: The gatekeeper and the advocate. *Journalism Quarterly*, 52(4), 618-626.
- Johnstone, J. W. C., Slawski, E. J., & Bowman, W. W. (1972). 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American Newsme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4), 522-540.
- Jones, D. (1970). Towards a native anthropology. *Human Organization*, 29(4), 251-259.
- Junker, B. H. (1960). *Field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ufhold, K., Valenzuela, S., & De Zúñiga, H. G. (2010).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How user-generated news use relate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3-4), 515-529.
- Kempny, M. (2012). Rethinking native anthropology: migration and auto-ethnography in the post-accession Europ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2(2), 39-52.
- Khamis, S., Vaughn, K., & Society. (2011). Cyberactivism in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How civic engagement and citizen journalism tilted the balance. *Arab Media*, 14(3), 1-25.
- Knight, A., Geuze, C., & Gerlis, A. (2008). Who is a journalist. *Journalism Studies*, 9(1), 117-131.
- Kovach, B., & Rosenstiel, T. (2001).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1st paperback ed.). New York, NY: Three Rivers Press.
- Lowie, R. H. (1937). *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NY: Rinehart & Company, Inc.
- Marcus, G. E. (1998).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son, J.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2 ed.). London: Sage, 2002.
- McQuail, D. (1992). *Media performance :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UK: Sage.
- Mindich, D. T. (1998). *Just the facts: How" objectivity" came to define American*

- journalism*.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inichiello, V., Aroni, R., Timewell, E., & Alexander, L. (1995). *In-depth interviewing : principles, techniques, analysis*. (2 ed.). Melbourne, AU: Longman.
- Musante, K., & DeWalt, B. R. (2011).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guide for fieldworkers* (2nd ed.). Lanham, MD: Rowman Altamira.
- Narayan, K. (1993). How native is a “native” anthrop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5(3), 671-686.
-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 (1988).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Nip, J. Y. M. (2006). Explo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public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7(2), 212-236. doi:10.1080/14616700500533528
- Nishikawa, K. A., Towner, T. L., Clawson, R. A., & Waltenburg, E. N. (2009). Interviewing the interviewers: Journalistic norms and racial diversity in the newsroom. *Th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0(3), 242-259.
- Örnebring, H. (2013). Anything you can do, I can do better?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on citizen journalism in six Europea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5(1), 35-53.
- Palmer, J. (2000). *Spinning into control: News values and source strategies*. London, U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Papacharissi, Z. (2009). *Journalism and citizenship: new agendas i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TS. (2015, February). Citizen journalism and trust in Taiw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eopo.org/events/about/english/P1-6.htm>. [Th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Public Media Alliance on 20 February 2015.]
- Reisner, A. E. (1992). The news conference: How daily newspaper editors construct the front page. *Journalism Quarterly*, 69(4), 971-986.
- Richards, B., & Rees, G. (2011). The management of emotion in British journalism.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6), 851-867.
- Richardson, J. E. (2005). News values. In *Key concepts in journalism studies* (pp. 173-174). London, UK: Sage.
- Rosen, J. (2006). 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

http://archive.pressthink.org/2006/06/27/ppl_frmr.html



- Schiller, D. (1981).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The public and the rise of commercial journalism*.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Schudson, M. (2001).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2(2), 149-170.
- Smith, P. (2007, March 22). Linnebank: 'Old media' must re-evaluate role. Retrieved from <https://pressgazette.co.uk/linnebank-old-media-must-re-evaluate-role/>.
- Spradley, J. (2003). Asking descriptive questions. In M. R. Pogrebin (E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criminal justice: Perspectives from the field* (pp. 44-5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pradley, J. P. (2016).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 Ståhlberg, P. (2006). On the journalist beat in India: Encounters with the near familiar. *Ethnography*, 7(1), 47-67. doi:10.1177/1466138106064827
- Tilley, E., & Cokley, J. (2008). De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citizen journalism: Who says what and why it matters.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14(1), 94.
- Tunstall, J. (1971). *Journalists at work: specialist correspondents: Their news organizations, news sources, and competitor-colleagues*. London, UK: Constable.
-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91).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9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 US news people at the end of an er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Wien, C. (2005). Defining objectivity within journalism. *Nordicom Review*, 26(2), 3-15.
- Zelizer, B. (1992). CNN, the Gulf War, and journalistic practi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1), 66-81.